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9月30日第57期

本期目录

【重庆武斗专辑3】

口述历史

李一士 口述 何蜀 记录整理注释 我怎么被卷入了“八二二”事件

附录 白衣秀士蔚然曾孙 一个杰出外科医生在疯狂年代的遭遇

故纸堆

周文川 提供 庞国义 整理录入 何蜀、庞国义 注释

一个中专学生对武斗与“现反”言论的交代

编读往来

郭予庆谈 56 期于运深口述和舒云的回复

刘建业对舒云文章的一点质疑

【口述历史】

我怎么被卷入了“八二二”事件

李一士 口述

何 蜀 记录整理注释

说明：文革中的 1967 年 8 月 22 日，在重庆市两路口山城宽银幕电影院门前的三岔路口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惨案：三个反到底派武斗散兵（不属于反到底派任何组织，自称“青年近卫军”）拦路开枪劫车，致经过此地的军车遭袭，五十四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遇难，文化处处长郝子义、保卫处副处长曾惠平、卫生科科长齐宗勋、参谋吴士龙等中弹受伤，这是五十四军在“支左”中遭受的最大伤亡。曾惠平受伤后被送到附近的重庆市第一工人医院（今重庆市急救中心）抢救，被逼迫负责手术的医生李一士（“右派分子”）按照伤情作了截肢手

术。事后，李一士被诬为“右派分子阶级报复残害解放军”，抓捕入狱并遭多次毒打折磨。在1967年12月9日出版的《山城战报》（重庆八一五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办）和《8·15战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合刊小报上，还以《一场惊人的反革命谋杀案——记警司曾惠平首长受害经过》为题，绘声绘色地描述：“由一个长期抗拒改造，早被撤销医务工作的右派分子李一士，执行这个罪恶的计划。下午三点三十分，一小撮坏蛋鬼鬼祟祟地进了‘手术室’，他们阴险地望着曾处长那只完全可以治好的右小腿（枪弹未伤及主要动脉血管和肌肉），违反手术操作常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截肢术……”编造了李一士“残害解放军”的情节。

李一士，1927年生。1949年作为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毕业生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编入西南服务团参加城市接管和新政权建设，1952年奉调到重庆工作。“反右派”运动中在重庆市第一工人医院被打成“右派”。在“监督劳动”期间仍刻苦钻研医术，1959年6月，“李一士首创不切口、不缝线的钳穿输精管结扎术，该技术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359页）但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右派分子”不能担任这样的“学术带头人”，而由领导安排另外“政治条件好”的人将李一士的技术学到后出面推广，并享有因此而来的各种荣誉及职务提升。文革中李一士因“八二二”事件被诬“残害解放军”一案，于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以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职称离休。2015年5月21日在重庆病逝。

时间：2012年11月5日、11月12日晚电话口述（未经本人审阅）。

我被划右派完全是单位上为了凑数。本来医院开大会宣布的右派没有我，到了晚上，领导到家里来对我说：你是右派了。我很奇怪，说大会上宣布的没有我嘛。我有什么右派言论吗？我没有对党的方针政策提过任何意见呀！领导说：你是没有对党的方针政策提过意见，但是你反对党小组长，党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反对党小组就是反党，所以要划你右派。

说我反对党小组长，其实是因为那个党小组长成天在外面跑，不干正事，我们医院外科只有四个医生，他跑了，他的病人没有人管。我说他不务正业，他说干党的工作就是正业。这就是划我为右派找的唯一理由，实际上是为了拉我凑数，硬给我找的罪名。

我不是党员，本来在西南服务团进军途中，在河南，在南京，都有领导动员我入党，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只想埋头搞业务，不想经常开会听政治报告，没

有申请入党。到了重庆工人医院，又动员我入党，我说我怕开会。后来虽然写了申请书，但是我也没有去积极争取。写了也就算了。

文革的时候我还是在监督劳动的右派。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不认错，所以一直不给我“摘帽”。

“八二二”事件的时候，本来我已经要走成都去躲避武斗了。当时医院的医生，两派的好多都跑了，医疗器械也被你拿一些我拿一些拿走了——各自拿去救护自己那一派的伤员了。我买了火车票，到火车站，都上了火车了，走不了，说是小南海¹那边在武斗，道路不通，上了火车又下来，在火车站外面的候车棚子里睡了一夜，等火车开。如果那次坐上火车走了，我就没得这场祸事了。

那天医院来人把我从火车站找回去，开始我都没有答应，说我要到外地去了，但是他们一趟又一趟来找我，一再要求我回去做手术，说是救死扶伤。我作为戴帽右派，也不好硬性抵制，只好回去了。可以说是把我押起回去的——来喊我的人人都带了枪的。其实我既不是反到底派也不是八一五派——我这个身份，根本就不可能参加哪一派。我就是想参加也没人敢要我。

当时医院里驻了许多反到底派的人员²，有个反到底派的医疗小组，组长是卫校³的老师梁国斌，他是个教病理学的内科医生，会一点外科，手术时就是他当的麻醉师。我回去后，院长杨中瑞（后来移居美国了）就叫我在他这个医疗小组里听他安排。

对于要抢救的伤员，我也不了解情况，只知道送来的是两个军人，一个是司机，胸部贯通伤，伤情很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肯定没有希望，但是当时医院根本没有那个手术条件，没有开胸设备，没有麻醉机……我去看了看，没有办法。另一个手术室里就是曾处长，腿部重伤，那条腿几乎被打断完了，骨头、血管、神经都打断了，血肉模糊，不知是什么子弹打的，我也不懂，看上去破坏性很大，只剩了一点肉皮还连着。一个半睾丸被打掉了，还剩下半个睾丸吊着。但没有生命危险。我只有先尽量采取了止血措施。等上面吩咐。

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在这个医院无法做手术，什么都没有，氧气只剩一桶，血浆只有两袋，手术器械也不齐。最好送走。但是他们认为必须抢救曾处长，说他整过造反派许多黑材料⁴，知道很多情况，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我一个手术医

¹ 小南海，重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站。

² 因该医院位于重庆两路口大田湾体育场旁边，当时体育场周边的重庆市委、体育馆及附近的重庆市总工会、重庆市文联、重庆市教育局等地均为反到底派控制区，驻有武斗人员。工人医院设有反到底派卫生总部。

³ 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的重庆卫生学校在1967年6月大规模武斗爆发后即由八一五派控制，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设于校内，该校反到底派人员出逃在外。直到8月初八一五派在建设厂清水池争夺战失利后撤离该校。但该校反到底派是少数，仍没有回去。

⁴ 1967年1月下旬在驻军支持下重庆造反派向原市委、市政府夺权，建立了由驻军代表为首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革联会下设专政委员会，曾惠平是专政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在随后开展的2、3月“镇反运动”中，专政委员会抓捕了许多造反派人员，据1967年4月17日革联会调查研究

生，又是右派，只能在这个手术室里等着听命令。那个司机因伤太重又无法进行手术，就在另一个手术室里死了。

我当时是没有决定权的人，只能是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知道病房外来往往许多，还有戴着“制止武斗工作组”袖章的军人到手术室里来过两三次。反到底派的头头是谁在这里负责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他们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军人要求把曾处长接走，反到底派不同意¹，一定要马上就地抢救。扯来扯去，一直谈判到下午，才让我开始手术。

手术的时候，医院的妇科侯主任和一个妇科汪医生来帮忙，另外还有个女医生是外单位的。梁国斌担任麻醉师，做全身麻醉。曾处长的腿当时只能截肢。我还尽量让他剩下的那半边睾丸保存下来，给他缝合好。我想到有半边睾丸还可以保留他的男性体征，可以长胡子。那唯一的两袋血浆就只够给他做手术用。他屁股上还有颗子弹没有取出来，当时无法拍片，找不到子弹在哪里，只能塞进纱布给他止血。手术做完他们就拉走了。

后来指责我为什么不作断肢再植？我说重庆当时根本就没有哪个医院能做断肢再植手术，外科医院才开始在用动物进行试验。而且要做断肢再植手术，那两袋血浆够吗？氧气不够，听说还是专门派了个司机到哪个单位去拉的氧气回来。

那个手术室也不是正常的环境，人来人往，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后来抓我是两个多月过后²。抓我那天，医院里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像是怕我飞了。当时我正在劳动，扫地。把我抓到警备区过后，在警备区里面那个草地上，大约有一连或者至少一排人，围着我打，当时就打断我五根肋骨，踢破一个睾丸……我的伤都是后来从二监狱³出来后在医院拍片才明确的，一边三根一边两根肋骨。

在警备区审问我，开口就骂：“你们这些反到底，就是反动到底！反革命到

小组《向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汇报（修改稿）》记载：全市2、3月镇反中“三县八区刑事拘留一千二百人，截至四月十七日已释放八百九十八人”。陆续获释的造反派人员大多成为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专政委员会就成为革联会下属机构中最为反到底派痛恨的机构。

¹ 据当时反到底派工总司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回忆，因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爆发以来驻军明显支一派压一派的态度，反到底派对驻军严重缺乏信任，害怕在伤员未做手术前即交部队接走以后发生问题说不清楚，因此工总司原则上要求完成手术确保曾处长无生命危险后才能让部队接走。

² 当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的梁兴初，因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闹矛盾，于1967年10月下旬离开成都住到重庆“另立中心”，与重庆驻军负责人一起公开支持八一五派派压制反到底派。11月2日至6日，梁兴初由五十四军和市革筹负责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等陪同，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三次接见反到底派负责人，进行严厉训斥，并在6日的接见训话中当场下令把“开刀的医生”抓起来。以此打压反到底派。梁兴初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被中央认定“旗帜鲜明地上了林彪贼船”，他被迫于1972年7月写的检查交代中说：1969年底“在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一次接见我们几位负责同志的会上，周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重庆讲话的批评，又一次严肃指出我那次去重庆的严重错误。”（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第三版。）

³ 位于重庆市市中区石板坡的第二看守所，俗称二监狱。不是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孙家花园的四川省第二监狱。

底！”我说我既不是反到底派也不是八一五派，我是“资产阶级右派”。那个军人指责我：为什么不给曾处长做断肢再植手术？我说重庆没有哪个医院能做这个手术。那个军人说西南医院¹就能做。当时西南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姓李，八一五派的，就坐在后面。我就指着他说：你问他能不能做？我认识他，以前在学术会议上见过的。他就把头低下了，不说话。那个审问我的军人戴着“制止武斗工作组”的袖章，开口闭口骂“你们反到底是反动到底”，“反革命到底”，我说你这样说不不对，毛主席说的两派要大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可以说哪一派是反革命²？你这不叫制止武斗，叫挑动武斗。他火了，叫我站起来，我站起来就不再说话，一言不发，僵持了十来分钟。他只好又叫我坐下。

后来关到二监狱（石板坡看守所）里，又打过两次³。旧伤上又加新伤。

在二监狱，既没逮捕我也没判我刑，只是拘留审查。这一拘留审查就是六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抓我进去，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放我出来。放我那天晚上，忽然把我叫出去，说你们医院来人接你了，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回去。也没有给我作什么结论，叫“教育释放”。

回到医院继续监督劳动，当勤杂工。一直不恢复我的医生工作。我找医院王书记要求恢复医生工作，她说抓你是梁兴初喊抓的，放你是鲁大东⁴喊放的。你去找他们去。这不是说横话吗？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她不恢复我工作，我说那你承不承认划我右派的处分？她说那当然承认呀！我说那好，划我右派的处分是降工资，并没有撤销我的医生职务，那就应该恢复我的医生职务。她没话说，只好不理我。后来我找她找烦了，她一见到我就躲。

到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过后，还不给我平反。我又找公安局，找市信访办，找政法委。都推来推去。公安局的那个人说你肯定是有罪嘛。我说什么罪你跟我说出来，到底是贪污吗，强奸吗，杀人吗？他说不出来。我说我是无罪释放出来的，没有判我的刑，我就是公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最后他说要去吃饭了，我

¹ 西南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代号后字 245 部队）第一附属医院，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当时由八一五派七医大红总（红色造反总团）控制，武斗期间成为八一五派救护伤员的重要医院。

² 1985 年 3 月 16 日，带领走访组专程来重庆看望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干部、听取意见的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李九龙（文革中在重庆“支左”时曾任九龙坡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公开承认：“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载《重庆日报》1985 年 3 月 20 日第一版）。

³ 1968 年 10 月起，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奉命移防云南，部队离开之前，曾有指战员到看守所将与“八二二”事件有关被押人员以审讯为名提出毒打泄愤。

⁴ 鲁大东，文革爆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政协主席，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66 年 7 月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被点名批判后，受命主持市委工作。后因此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夺权的主要对象。1968 年 4 月中央首长在“四二七”指示中否决了五十四军一直想结合的另一位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江青称“辛易之滑头滑脑”）后，不得已将鲁大东作为“结合”对象考虑，并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协助其突击写出检查，揭发李井泉、任白戈“罪行”，得到通过，被安排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5 月 31 日成立）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6 月 2 日成立）副主任。1969 年 10 月任重庆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69、1973 年分别在中共九大、十大上被安排为候补中央委员。1971 年 5 月任重建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8 月起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1973 年 12 月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说我跟你一起去，我吃客饭自己掏钱。他气得不得了。

一九七三年放我，拖到一九八三年才给我平反。整整拖了我十年。听说还把我写的手术报告送到总后勤部去找专家审查鉴定过。

据说是市委一个副秘书长负责我这个案子，当时卫生局里有不同意见争论，原来外科医院的院长当时是卫生局的顾问，说李一士没有罪，是救死扶伤，有功！先还通知我，说市委领导要接见我，听说我脾气不好，叫我在市委领导接见的时候不要发脾气。说一周左右就接见，但是等了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后来我去问，说是你们医院不同意平反。这样又拖了一阵。

是卫生局到医院来开全院大会公开平的反。没有给我书面东西。

我离休过后，参加一些原西南服务团老同志的活动，也写点团史方面的回忆。对文革这些事，我还没有想到要写。

附录

一个杰出外科医生在疯狂年代的遭遇

白衣秀士蔚然曾孙

按：本篇发表于白衣秀士蔚然曾孙的博客，2013-12-23 21:44:47，2015 年 7 月 18 日下载。略有删节。

李一士的故事，颠倒黑白的年代，“钳穿法输精管结扎术”的发明和“警司曾处长截肢事件”的前前后后。这是关于我的一位老师的故事；其实没有故事，只有纪实。

1952 年，重庆市第一工人医院外科主任胡先华接收了 3 位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医生。他们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李照明、四川医学院（原“华西”）的陈维庭、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李一士。其中李一士还有解放大西南时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经历，他也是 3 人中最聪明、英语很好，胡“老板”最喜欢的一个。然而，众所周知的 1957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他的命运和一切都改变了；从此再也不准上手术台。1963 年初我见到他时，已经是只坐门诊而且只是医生，连管两三个门诊外科医生的组长也不让他担任，其他轮转到门诊的年轻医生包括我，都当组长管着他，“监督”他。

尽管如此，他在门诊小外科工作条件下仍然施展他的智慧，琢磨创造出了“钳穿法输精管结扎术”，这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发明。因为传统的输精管结扎术，是要切开阴囊，费时地寻找到输精管，解剖分离出来并用组织钳提出，再结扎、切

断，双侧输精管一一结扎后，止血、缝合阴囊。这样的手术损伤大，出血多，手术中和术后的痛苦不适明显，几天后还要去医院拆线。而且阴囊内遗留的瘢痕大，容易形成长期扰人的痛性结节，严重时导致性功能障碍。而他发明的钳穿法，先用“三指固定法”即拇、中、食三指从前后把摸到的输精管稳稳固定在阴囊正中，绷紧阴囊前壁后输精管变得十分表浅。然后注射仅 2 毫升局麻药后，用他自己磨制的“输精管分离钳-尖嘴钳”在输精管表面的阴囊皮肤上纵行分开 0.5 厘米的小口，再用尖嘴钳紧靠硬硬的输精管两旁分离出 1 厘米，然后用他特制的“输精管固定钳-小圈钳”夹持住输精管稍提出皮肤，仍用尖嘴钳剥开输精管鞘膜后，另用一注射针头弯成的小钩穿过输精管可靠地掌握住，即用线将钩住的输精管两端结扎，将钩住部分剪去半厘米；双侧均如此结扎后，松弛的阴囊回缩后仅 0.5 厘米的伤口随即闭拢，无须缝合。用 3 厘米见方中央剪一小孔的胶布，里面垫上更小些的纱块，粘贴伤口上。受术者坐着休息一刻钟，再观察敷料小孔；只要没有渗血，便可回家；3 天后自行揭除敷料即可。手术时间只需要 5 分钟（而原来的传统手术方法至少要半小时）；接受手术者也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术中和术后的痛苦。这样大的手术创造改进，使当时推行男性绝育手术的局面一下子打开，动员工作阻力变得很小。随着当时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对这一手术方法的需求迅速扩大，先是重庆周边，然后西南地区，直至全国。或是邀请“一工”派人去做手术，或是派医生来学习这项手术。我是这项发明的见证人之一，也参加过磨制手术器械。当时，给年轻医生每人发一块小油石，几把什锦锉，用它们把弯文氏钳（12.5 厘米血管钳）锉磨成尖嘴钳；把直钳前端锉成两个半圆弧，做成输精管固定钳；把有柄探针做成尖钩。直到后来，器械需求量太大，才由重庆江北的一家小厂按图批量制作。但是，当李一士做出这一重大发明后，上面以右派分子不能承担如此重要的计划生育政治任务为理由，指派别人在他那里突击学会这一项操作技术，然后四处出差去做手术和传播这一手术方法；也取代他获得种种荣誉；跑遍大半个地球推广介绍这一技术——当然主要是“第三世界”，因为发达国家是不推行绝育手术的。

而他自己，就连门诊医生的资格也很快被剥夺了。1964 年，仅在 3 个月期间内，我亲眼见证了他又遭遇的三次变迁：先是在门诊由医师降为医士；然后，右派分子怎可以在门诊为广大工农兵群众看病？到图书室当管理员去！最后，阶级敌人应当接受改造，怎能在图书馆那种轻闲的地方？滚去打扫厕所！于是，前面扣钮扣的医生白大褂，换成了背后拴带子的清洁工蓝大褂。即使如此，老师仍十分讲究，头发梳理得规规矩矩，黑皮鞋擦得锃亮。而且，到这种地步，和他感情很好的夫人朱文珍带着小孩仍未与他“划清界限”离婚。朱文珍是很能干也很有气质的手术室护士，总是梳着法国式发髻，下班离开手术室前都会认真整理头

发。我在厕所碰到李一士，仍然会恭敬地叫一声：“李老师！”“高老弟，不要叫我老师，他们会说你划不清界限，会影响你。”“我父亲也是右派，我还怕什么！”因此，我一直保持着对他的尊重，也就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师生关系。

更为可怕的灾难来了！

文革开始后，全国闻名的重庆武斗逐步升级。重庆是兵工基地，在“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的火并中，开始还用钢钎，很快就真刀实枪了。除了没有空军（没动用飞机），海、陆武器是绝对齐全的了，而且都是重庆各军工厂制造的。当时重庆的军工生产，除了自动步枪、子弹、双管和四管高射机枪，还有常规和水陆两栖坦克等等。全都出现在重庆大街和长江上的武斗战场了。到了1967年热天，已经上升到高潮。这时，重庆第一工人医院由于地势较高，可扼守两路口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交通要口，便被“反到底”占领作为据点。医院的人员绝大部分早离开了这是非之地，留下与所谓“战地医疗队”（多数是其它单位的，如重庆卫校等）在一起的仅是极个别。

1967年8月22日这天，重庆警司的吉普车在经过两路口时遭遇火力袭击。警司曾处长的左腿被打断后，被“反到底”弄到一工医院。警司来人要接回治疗，造反派堂而皇之地说病人情况不容许搬动，必须就地抢救，拒不把人交给警司；其实就是为了扣下个军队支持对方造反派的证据。所谓“战地医疗队”那帮热衷于“革命造反”的，你想会有什么能耐！医疗队正副队长只是防疫站人员和卫校一个内科教师。于是，他们开始害人了。就是他们，为了“革命”目的，把李一士搞得家破人亡！当然其他许多人对此都是犯下罪孽的。本来，让人家把曾处长接回去就是了，但既扣下来总得找医生动手术。外科医生早就没有一人还敢留在医院，不幸的是突然冒出本院一个不知什么东西出来“点水”（注：川语，出卖、指认身份之意）说：“李一士今天才走不久，可能还在火车站！他以前是外科医生。”原来，作为被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李一士，在其他医院人员没跑光时，他是不敢跑的，直到这天见打激烈了，医院里除非铁杆“反到底”，最后都跑光了。他这才在出事前到菜园坝火车站买车票准备回湖北老家。闻说如此，造反派头头大喜过望，派几个提着枪的“工人造反军”追到火车站。不知天下的不幸是人为还是命中注定，李一士竟然真还没走掉！对着荷枪实弹的几个大汉，听着造反派“你把手术做了，我们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的胡说八道，他还能怎么样？被押回医院，在那位内科教书先生的蹩脚的麻醉技术下，在一个妇产科医生的台下指挥下，已十年没上手术台的李一士，完成了左下肢截肢术，并且成功地挽救了伤员的性命。

按说，远离手术台多年，仍能顺利完成截肢术且保住病人性命，已经难能可贵，谁都应该赞许的。就别说感激罢，但为什么非要恩将仇报，而且还非把救人

之人置于死地？这就是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警司方面对“反到底”的恶气没法出，因为在当时，它也算造反派；只有李一士是可以任意踩死的蚂蚁，为了打击“反到底”，不惜拿无辜甚至救了人命的李一士来当替罪羊。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什么不断肢再植！为什么让一个阶级敌人搞阶级报复，把解放军处长的腿锯掉！这个右派分子罪大恶极，罪该万死！”说到这里必须把医学重要背景说明一下，免得是非不明：一、中国的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是1963年在上海由骨科专家陈中伟和血管外科专家钱允庆等不同专业医生协同完成的，是断腕再植，病人叫王存柏，而且是在和平时期的情况下从医院、上级部门到社会，都在积极组织、会诊、物质设备和人力资源提供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时隔4年，到李一士在已成烂摊子的医院里截肢救了人命的时候，全重庆包括两个医科大学即第七（后来改称第三）军医大学和重庆医学院，都没谁做过断肢再植术，胡先华不是搞骨科的，当然更做不来，怎么要李一士一个十年没上手术台的人做下这手术，岂非天方夜谭？二、即使今天，断肢再植的条件仍须断面整齐，组织活力尚好，王存柏就是机床造成的整齐断腕；而我见过当年发布的曾处长截肢前的伤部照片，被打得血肉横飞、组织毁损，怎么再植？这是在要医生还是在要孙悟空？但那个时代就是要人命不讲道理的；一位司令一句命令，出发一队军人就去抓了李一士投入监狱，而且脚上加了很重的大镣。被挑起仇恨的不明真相的战士，一个班一个排，只要想批斗这个“残害”他们首长的“阶级敌人”，就拖出去边殴打边批斗，受尽折磨。一次被熟悉的人看到他被批斗完后，由一边一个人扯着他两支胳膊，从街上拖过，下半身在马路上擦着，双腿直直瘫着，满是血迹的脸朝着苍天，没有任何反应。看见的人回来说好像是已经被打死了。这一消息传给了已经下放到綦江县的朱文珍，当时也根本不可能再进一步查证消息，谁敢打听！要知道林彪事件未发生前，当时是个什么局面。这种情况，以后小孩怎么办！不得已，终于离婚了；对这样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自然是单方面提出就成了。朱文珍后来带着小孩另嫁后，回到了湖北老家。拿李一士开刀后，造反派医疗队头头受到的最大冲击就只是戴白袖笼扫地。抓李一士时，重庆“反到底”总头头也表示支持。为了保自己，一个当了几天兵转业复员的工人，也可随便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医生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就是那场不知由谁发起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事件发生后过了不久，因为主持整李一士的个别军队头头也“上了林彪贼船”，李一士终于被放出来了，才知道这次自己是真的已家破人亡。刚出来还是打扫厕所，直至1978年全国“改正右派错划”，才恢复了在门诊当医生。当时我知道消息立即进城到“一工”外科门诊室看望他，苦涩地表示祝贺；并告诉他，我的父亲也改正了“错划”，可惜此前一年已含冤去世了。他受那么大苦，却为

我的父亲叹息，并说：“老弟，这下你也好！”又过了两年，让他去三军医大学进修了泌尿科，回医院主持该科工作，后来当该科主任。但不幸患了一次“视网膜出血”，后来视力不太好。我们医院第一例肾破裂成功采用肾动脉选择性造影和栓塞术，就是他在 1987 年率先开展的。

“拨乱反正”后他虽从苦难中走出，甚至后来因曾有“西南服务团”经历，还给予比“退休”稍优厚的“离休”待遇，但有两件事始终让他周围为他不平的人感到遗憾。首先是“钳穿法”，从医院院长到胡先华主任和其他主持正义的人们，都多次向上反映意见，希望有关部门能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他对“钳穿法输精管结扎术”的发明权，甚至适当给予应有的奖励。但当时在国家分管计划生育的最大领导者，置事实和民意不顾，借口所谓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名誉云云，对被整得如此惨的李一士，连还原这点事实的公正之心都没有，当官是为了干什么？另外，就是原配夫人知道李一士还活着，曾多次从湖北来找过他，但他大抵是已经太心灰意冷，都拒不相见。1987 年朱文珍又到重庆来想见他，碰到我时还流着泪对我说希望我能劝劝他，容许见一面。这时的李一士也已另外结了婚；我当时真心里也不是滋味，为了他们一言难尽的遭遇！

如果不是从 1957 年起，才当了 5 年医生的李一士就被一步步扼杀，他会成为怎样杰出的外科医生？如果不是对“三钱”只重用了一个钱学森，甚至听信他的与物理学毫不相干的用数学算法得出来的“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的结论，而对另外两个不会巴结只说真话的大物理学家，一个钱三强差点打成右派，很久一个时期使用中仍然受到压抑；而彻底打为右派的钱伟长就更不用说了，到老来“改正错划”后，才象征性地当当这里那里的名誉校长之类，3 个物理学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会比一个少吗？如果不是“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把无数优秀少年掐死在摇篮中，剥夺他们受高等甚至中等教育的机会，那么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实在有太多太多无法挽回的如果！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每个真正有良知的爱国者，恐怕都希望深深记住教训，沉重的历史绝不要重演！

【故纸堆】

一个中专学生对武斗与“现反”言论的交代

周文川 提供

庞国义 整理录入

何蜀、庞国义 注释

说明：这是文革时期的重庆机器制造学校（简称机校）学生周文川在群众造反运动结束之后的1968年12月至1970年1月被审查期间写的部分交代材料，原材料共约6万字，因有不少对同一事件反复交代的内容，录入时对不同交代中涉及同一事件的内容作了合并、删节处理，按所述事件的大致时间先后重新排列，增加了序号和小标题，订正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检查交代中提到的人物姓名除众所周知的机校兵团团部主要负责人和已经死亡的人员外，其余人员作了隐名处理。为便于读者理解，酌加了一些注释。

周文川简介：男，生于1947年，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1969级工专106班学生。文革期间曾任八一五派机校革命造反兵团后勤部长兼工专分团团长，“一月夺权”后任校革委会后勤部长，参加过武斗（主要任务是安排后勤供应和开汽车等）。1968年底因武斗期间涉嫌“命案”和有“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被工宣队在全校大会上突袭揪斗、关押，毕业分配时留在校办厂



接受监督劳动，审查近三年。后确认“命案”不实，所谓“现反”言论也并未严重到“恶攻”的程度，经本人不断上访申述，且在监督劳动期间工作积极肯干，深受教职工好评，上级机关下文按落实政策处理，留在本校校办厂正式工作，工龄从毕业分配时起算，工资按规定标准全额补发。

感谢周文川先生无私提供这份对文革研究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上图：2013年春节周文川在重庆沙坪公园安葬着同校多位同学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留影。）

第一部分 对武斗问题的交代

一、参加武斗的情况

到解放碑抓徐光明¹

¹ 徐光明：1945年生，重庆大学无线电系68级学生，最早上京告状的学生之一。群众造反运动中在重大成立了人数极少的红岩公社，因其既反对“黑市委”又反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被八一五称为“托派”。1967

(19) 67年5月下旬有一天,我听夏高万、邓××、贺××说:城里解放碑附近一个地方反到底¹各大组织要召开一个重要秘密会议,商量当前的对策和行动,还说有重大徐光明参加。邓××、贺××(红造司²工作人员)说:红造司为了得到情况,派我校去开会地址抓一人,并已和29中(或者是六中)联系好,他们在那里点水³并派出部分人出面应付情况。最好能抓到徐光明。并叫我派一辆学校的汽车去。

于是我就去喊驾驶员,其他司机未在,我就叫李××出车。李××问:到哪里去?我说:到城里去抓一个人。当时李××就忙说:去抓人我不敢去,我们又不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得有个手续,这是犯法的。

当时我和夏高万、邓××进行劝说:我们是为了了解情况,去抓一人来问一下,没关系,群众组织之间的事,出了问题我们负责。李××推说:引擎才修好,开不快,又没有汽车电门司维子⁴(在杨××那里),我说:就把线路(电门线路)接通开嘛。

李××推不过了,就接通了电路,开车出发。行至马家堡时,车子确实上坡时走得很慢,用一档才走得动。李××又灰心地说:今天硬是不该去,随便抓人要犯法,我又是驾驶员。并要求返回学校。我当时坐在驾驶室,还有邓××都说来都来了,去了再说,看情况,出了事我们负责。就又向前开。由邓××指路。车行至鹅岭公园下坡时,李××还停车试了一下马达看电足不足。随车一起去的有20多个人。

车子开到解放碑附近一条小街巷里停下(已是11点多钟),其余的人都下车分散了,有的装着问价要买东西,有的装着看大字报。我和李××坐在车子附近

年2月曾被八一五派中学生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局关押。后释出到北京参加了1967年4月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回重庆后被推举为刚成立不久的重大井冈山公社及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负责人。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任常委。1968年毕业分配到成都132厂。1970年四川“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中被揪回重大审查。文革结束后再被清查。后参加国家863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工作,被评为国家863计划15周年先进个人,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后继续从事企业信息化工作,任企业信息网四川分网理事长。

¹ 重庆的造反派以1966年8月15日的“八一五事件”(重庆大学已公开向工作组造反的师生到重庆师专去声援该校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成为文革以来重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为标志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后,经历过“糟得很”与“好得很”的激烈争论,终于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官媒反复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大气候下,使“八一五好得很”成为社会上的主流舆论,重庆造反派即统称为八一五派。但在1967年1月因夺权引起造反派分裂后,围绕对夺权建立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的不同态度,坚持捍卫革联会的称八一五派,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称砸派,1967年7月下旬起改称反到底派。这里所写的事件发生时(6月初)尚无“反到底”之称,但作者写此交代时已习惯于在正式场合使用“反到底”的称呼(在非正式场合八一五派一般称反到底派为“砸派”、“砸匪”)。

² 红造司:即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设于重庆市少年宫。原为重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统一组织,两派分裂后成为八一五派的红卫兵组织。反到底派于1967年夏另行组建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设于重庆医学院。

³ 点水:方言词,指暗中指认某人的真实身份。

⁴ 司维子:即汽车点火开关(或称汽车钥匙),英语switch的译音。估计是抗战时期由援华美军或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引入,所以重庆及四川等地的汽车司机多习惯用此说法。

一长航单位的大门口等。当时李××很后悔不该来，我劝他来都来了，算了，反正还有这么多人保护。

等了很久，看到开过去一辆小吉普，里面坐了一些大汉，估计是保镖的，里面有徐光明。

约 1 点半钟，又看见一些学生拿了一些大字报来街上贴，听同来的人说是 29 中来参与接应打掩护的人。就是说当抓人出现紧急情况时好支援（因事先听说开会的地方有很多保镖）。

大约 2 点多钟，贺××跑来叫快准备车，抓到了一个红中司¹总部联络员，开会中途出来时，被 29 中的人跟踪点水抓住。李××和我就立即上车发动向前开，看见前面有几个人扭住一人向车跑来。街上已经闹动了，后面跟着那个联络员一起的两个人想把人抢回去并高喊：乱抓人！

有很多人前来阻拦（可能是反到底的），但被我们的人拉开，并造舆论说那人是我校的同学，他偷了同学的被盖等物，我们特地来抓回学校的，于是就没有好多人拦了。由夏高万等人把抓的人拉上了车，并把头蒙住。但车被人群围着，有两人还冲上来在车头上趴着拦车。

李××吓倒了，赶忙停车熄火。我急忙说：停不得，危险！一会儿他们的人赶来了！就急忙又把电路接通才未熄火。

这时拦车的人已被我校在车下伪装成群众的人拉开，同时还有部分我校及 29 中的人在下面解围，拦住人群。于是李××就慢慢地把车开出人群加油就走。路经解放碑、一号桥、上清寺回校。

回校后由夏高万、王××、郑××等人拉到行政楼上问情况。后来听说，由夏高万等人问了情况，教训了一顿后放了²。

第一次攻打煤校³负伤

（19）67 年 5 月下旬，我校应中梁山 815 的要求（说煤校 830 在那一带很

¹ 红中司：指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由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中学生红卫兵红一方面军、井冈山红卫兵中的中学生部分等联合成立于 1967 年 9 月（大规模武斗暂告结束之后）。在这一交代所写事件发生时还无此组织。作者写交代时用了后来习惯的称呼。

² 这个被抓者有可能是重庆师专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发起人黄开全，高三学生，1967 年 4 月 7 日曾组织刚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在解放碑地区举行了第一次呼吁“砸烂革联会”的大游行。据黄开全回忆，他是 6 月 5 日在解放碑附近五一路煤管局办公楼内的川煤总部参加徐光明召开的井冈山红卫兵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时，得知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他要去建设机床厂找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求援，在五一路公交车站等车时被绑架的，关押六天后释放。在他的回忆录《峥嵘岁月——往事的回忆》（网络发表）中对此事有详细记叙。但黄记叙的时间与周文川交代所说的“5 月下旬”不合。从周交代后文写到西师“六五”事件时他们去西师一节可知，他们不会同时在 6 月 5 日到解放碑执行抓人任务，而且抓人时的种种表现与“六五”事件时两派大规模武斗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³ 煤校：重庆煤矿学校，在九龙坡区张家湾。

可恶)，由夏高万、袁明利（已死）¹带领学校武斗人员 60 多人乘叶××、秦××开的学校南京牌和嘎斯 51 汽车前往上桥攻打煤校。我也去了。车一直开进煤校后，我们下了车，车子开走停在上桥公共汽车站附近。

但对方已有准备，煤校 830 的地势很好，守在校园内建筑左面一高地势的红砖教室大楼里（我校武斗人员带了木棍、弹枪，还用布包背了些石头，我当时拿了个木棍）。

一会儿七医大²红总³也开了两车学员来，也被石头打伤几个。当我们冲到石梯上往上冲时，房上 830 的人便向下猛摔石头、砖头、鹅卵石、木棍等物。由于我和夏高万、袁明利冲在前面，躲闪不及，被一摔下的鹅卵石从地上跳起来打中我的头部前额，当时鲜血直流，我班蔡××就把我扶到煤校医务室去包扎。

当时医生在作准备和对纱布等进行消毒，叫等一会。这时蔡××就说：我出去看一下。回来后对我说：周文川，我们的人不见了，可能撤回去了，并说现在四周都是砸派的，我们也未暴露观点，等候包扎。一会儿又进来几个伤势较重的人并大骂保派⁴（指 815 的），蔡××忙说我先走了，你包了伤后自己回来，于是他就走了。

我在那里用手按住受伤处要求医生快点包，医生叫我等一下，先看伤重的。过后他给我的伤口上了药，包了纱布（在头上缠了一圈），包好后我便溜出医务室，一看我们的人都走了，都是煤校的人，还有一些支援煤校的中梁山电机厂工人。忽然我碰到了原我校毕业的 416 学生丁××。他见我就说：你们学校到这里来武斗，太要不得了……我扯谎说自己是坐车玩，想来看闹热的，没参加武斗，还被石头打伤了，所以我没敢再和学校武斗队一起，怕再挨打。我考虑如果被抓住了，还可以通过丁××关系救我。我和丁××谈话后见无人注意我（都以为我是自己人），就装出一副好像被保派打伤，要出去报仇的样子，向校门口走去。

到校门口后我看见我校的人在夏高万带领下还想冲进来，被煤校武斗人员在校门口拦住，中间隔有一座小桥，双方对摔石头。105 班的××比较亡命，站在石桥上用木棍挡石头。这时我看旁边没人，就向右边田坎上溜走了。过了小河沟看见秦司机也在河沟田坎上观战，就与秦一起上马路回到停车处，我就坐到嘎斯 51 车驾驶室里，没再参加武斗了。

¹又作袁明弟，文革中更名袁向东，重庆机器制造学校电 222 班学生，机校兵团驻革联会联络员。1967 年 7 月 30 日晚运子弹路经上清寺转盘时在驾驶室中弹身亡。终年 21 岁。

²七医大：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代号后字 245 部队），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1969 年 8 月奉命迁上海（原在上海的二医大迁西安，原在西安的四医大迁重庆）。1975 年 5 月又奉命“为利于军医大学长远建设，消除林彪及其死党邱会作一伙造成的严重后果”迁回重庆，同年 8 月奉命改名为第三军医大学。

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当时重庆军事院校中八一五派的主力。

⁴保派：指保卫革联会的八一五派。1967 年春围绕革联会问题重庆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认定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要坚决保卫，一度被称为保派，但因“保派”与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容易混淆，所以后来一般还是称为八一五派。

我看见夏高万带着武斗队到煤技校¹去了。过了一会夏高万又领着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拿着挡石头用的床草垫子又向煤校去了。这次还有新六中 32111 的打着一面武斗旗帜去了。但还是攻不进去，夏高万就带着全体武斗人员乘车从凤鸣山回校了。

到重医参加武斗

(19) 67 年 5 月中旬杨金华²说：重大派人到重医³去游行示威，如发生情况叫我校出动武斗人员攻打重医，并接应他们的人。后来听说重大的人被打了，杨金华就带领学校武斗人员手持木棍排队前往重医。到重医先排队在大操场，并向北大楼打弹枪摔石头，我也打了弹枪。

一会儿河校航锋⁴的来了，并冲出大楼向我们冲来，被杨金华组织反冲锋赶回去了。重医兵团的人还在楼上用闪光照相机对着我们照相。不一会儿钢校⁵钢铁兵团来增援重医，杨金华怕我校被夹在中间吃亏就撤出了重医。在大门口碰见钢校的，面对面走过，我们的人就大骂“钢二流”，未打起来。

行至重医附一院那段路，杨金华叫我校的人分开站在路的两旁，准备等钢校的人回来时夹道“欢迎”。过了一阵支援重医的人回来了，先放过了一些其他单位的未打，只骂了一阵。当钢校的人来时，便对其进行了挑衅，打了冷捶⁶。回校时碰见建工校⁷“鲁迅”的人也来支援我们，就一起返回了。

(19) 67 年 5 月下旬，重大开了一辆灰色米尔小吉普到我校，说他们的一车乐器被抢了，叫我校配合去打重医婊子兵团⁸（那时我们称重医叫投机兵团）把重医的车子抢了。

杨金华就集合了武斗队前往重医去了，还有几个重大开会开车的学生及校车运来的一车人。后我才慢慢的赶到重医看情况，走到重医大校门时听看热闹的人说

¹ 煤技校：重庆煤矿技工学校，在九龙坡区张家湾。

² 杨金华：1945 年生，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 319 班（67 级）学生。八一五机校兵团勤务组成员。1967 年两派武斗中任机校联合兵团武斗指挥，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成员，潘家坪前线指挥部成员。1968 年 8 月毕业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工作。因 1967 年 8 月武斗中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撤退前发生了枪杀俘虏事件，被人诬告他参与了开会研究，1969 年 9 月被以“武斗杀人”罪名隔离审查，后押回重庆关进九龙坡区看守所。文革结束后 1979 年 12 月 28 日（赶在新《刑法》正式实行之前）突击宣判有期徒刑十年并释放出狱（因关押时间已满）。后在私营企业工作。曾获重庆市质量先进奖。

³ 重医：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位于沙坪坝区袁家岗。当时该校由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控制，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军工井冈山总部等均设于该校，使该校成为反到底派的大本营，也成为八一五派攻击的重要目标。

⁴ 河校航锋：河校，即重庆河运学校，位于沙坪坝区石油路，航锋，指重庆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反到底派中专学校中的主力，武斗前期名噪一时，被八一五派称为“武斗之花”。

⁵ 钢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当时在九龙坡区杨家坪。

⁶ 冷捶，方言词，指乘人不备时给予拳击。

⁷ 建工校：建设机床厂技工学校。

⁸ 因反到底派重医兵团女生多，被八一五派骂作“婊子兵团”。

机校的进去抢车去了，我怕找不到地方被重医抓住，就没进去。

一会儿看见重大的几个人开着一辆重医的红色高级小旅行车出来开走了，一会儿看见李××也开着一辆抢重医的美式中吉普出来了，我就爬上了中吉普，由李××开着经河运校、两路口、化龙桥开到重大团结广场汽车库去了。在重大，和重大的人一起，由重大的一人开回了学校（当时随车的还有另两个学校的人记不得了）。这辆车后来坏了，（19）68年重医找回去修好了。

为西师6·5事件参与人员送食物

大概是（19）67年6月4日下午，杨金华集合了全体武斗人员宣布说：西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¹，现西师春雷被831围在新图书馆大楼进行进攻，非常危急，急需支援，并已和石油校大庆公社、五一校等主要武斗单位联系好一同去北碚增援，又谈了一些我们机校如何如何的鼓舞士气的话。并还说：先到石油校集中，晚上再出动。

当时我和彭期远²、陈洪明、夏高万等团部负责人都认为距离这么远，路上比较危险。万一出了事，全校这么多人，怎么负得起责任。当场提出反对，叫杨金华不要去。

但杨金华根本不理，坚持要去。由于他掌握武斗指挥权，同学又相信他，认为他有指挥才能又会见机应变，所以听他的，少数胆小的下车未去。

我们几个都非常生气，当时议论杨金华什么都好，就是太独断专行。夏高万、伍振友也是团部分工搞武斗的，也就未去（不知是怕死、怕负责，还是生杨金华的气）……彭期远更是反对，但他的分工是主管召开团部会议和检查每个人工作的，没有实权，也没办法。

共去了两车50多人，由叶××驾驶学校南京牌汽车，秦××驾驶嘎斯51汽车（是杨金华在集合队伍之前叫我去喊的驾驶员，当时他只跟我说要我去喊驾驶员说要到北碚去）。听杨金华说从青木关那边去的先到石油校集合，后到重大集中一起去的，共10辆车。石油校也去了两车，去了驾驶员。当晚出的发。

¹ 位于重庆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原由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控制，但在1967年春因西师八三一成为反对革联会的主力，在2、3月间的“镇反”运动中遭到镇压，被宣布为“右派组织”解散，主要负责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八一五派在该校建立了一个拥护革联会的春雷造反兵团。4月西师八三一被捕人员获释，恢复重建组织后，即与春雷不断发生冲突。6月5日至8日两派在校内新图书馆大楼大规模武斗，市内两派均派出人员前往增援，成为重庆两派开始大规模武斗的标志性事件。

² 彭期远：1945年生。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机修专业307班（67级）学生。共青团员，三好学生，五好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文革中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机校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1967年大规模武斗期间任机校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当年毕业分配到重庆工具厂当工人。1975年加入中共。1976年任厂革委主任、厂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1979年底被免去党政职务，到机修车间当工长。1980年后先后任检查计量科、安全环保科等部门副科长，供应科（处）科长（处长），兼重庆工具厂产供销支部书记。2002年退休。退休后任退休支部支委、巴南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第二天，彭期远、陈洪明我们几个很担心，打电话也打不通。就叫我领点钱买饼子，到冰厂拉冰糕给他们送去。但财务科郭××说没有流动资金了。我就找管伙食的牟××借了50元伙食方面的现金，买了些饼子，并叫杨××出车开猛进车。杨××开始不愿去，推说：车才大修好，走不快、不好用、怕出毛病。我就说去借卫校¹李×的十轮卡车，一路上保证安全，他们用过我们的猛进车，叫李×去联系。杨××一看不行就只好同意开猛进车去了。

去时是下午出发的，还有10多个武斗人员押车，李××也一起去了，伍振友也去了。团部还叫了两个找得到沙坪坝冰糕厂的人去，到沙坪坝陈家湾冰糕厂后，便叫一个才领到一箱冰糕的中年妇女和我们一道去北碚。我们说到那里很快就会卖完的，她也想坐车不要钱，领冰糕出来的时间晚了，就同意去了。

到了北碚后，我们就停在左边通歇马场、右边到北泉的岔路口了解情况。群众都说重庆来了很多八一兵团的，打了一天，没冲上新图书馆二楼（因西师8·31冲上并占领了二楼，三楼是春雷的），只冲进了一楼，攻不上就撤了，人也非常疲劳。

于是我就和李××等几个人从岔路口岩边上的小路到西师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先到新图书大楼，看到隔大楼很远的地方围满了观看的人群，花木都踩死了。上面不时的向下面扔石头，打弹枪。大楼下面坝子上到处都是扔下来的砖头石头等。喇叭播送着强烈抗议重庆八一兵团、黑警司到西师挑起武斗的文章，骂解放军等等。看去一片经过激烈武斗的情景。

西师春雷的喇叭未广播。大楼窗户上都遮上了草垫。还听群众说：大楼还失了火，火警来救被打倒很多，解放军要上楼也被打伤打死，8·31说他们是来参加指挥武斗的。当我们问八一兵团的人到哪里去了时，都说不知道。没有打听到下落，我们又回到岔路口汽车处。

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叫卖冰糕的人就把冰糕卖了，后剩下极少数，她拿了些给我们吃说不要钱（开始我们都是自己拿钱买）。后我们听说八一兵团的人撤到北碚街上人民礼堂去了，我们就赶忙到那里去，那里有不少本地武斗人员，我们到楼上指挥部一问，才知我们的人走了。他们还以为我们就是，要求我们不要走，走了他们很危险。

当时我们就回到停车处，决定返回学校，并打听到有几车人从我们来的方向走了，天色也快黑了。我们便赶快返回。杨司机也催快走，开到井口天已黑，被二机校²的拦住（当时卖冰糕的就叫我们把剩下的冰糕吃了，有的不想吃，我们给了些给二机校的人吃。她的本钱还是卖到了）。

二机校的人说车子过去了，在双碑被工厂的拦住了，说去很危险，不知情况

¹ 卫校：重庆市卫生学校，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与重庆机器制造学校相邻。

² 二机校：重庆第二机器制造学校，位于沙坪坝区井口柏树村。

如何。杨××也不愿去。伍振友就叫留下部分人，叫杨××和几个人把车开到二机校去了，二机校的也随车回去了几个人。

当时我们集合了人要求二机校的一起前往双碑（伍振友集的合），二机校的武斗人员也要求去，但负责人不同意，怕走了学校遭到袭击（因他们吃过亏）。他们还是决定守路口拦车。我和伍振友、李××等人也就和他们一起拦车。拦到了一辆工业校的卡车被押回学校去了，后又拦了两辆反到底的小车，有一辆吉普车由李××开回了二机校，我也随车到二机校。

半夜下了小雨。后又乘二机校的卡车回井口，把全部人接回。我和伍振友等几个人饭后又到电话室找他们负责人了解双碑情况，一直联系不通。搞了很晚，总机通过几条线路打听才了解到双碑的情况已解除，那时已是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为了怕走晚了天亮出危险，我和伍振友、邓××等人就去找杨司机，找到后就立即开车回走。大家都估计这么晚，又下雨，路上拦车的一般回去睡觉去了。一路上杨司机开得很快，开到双碑那段路口，看到很多大木料等拦路的障碍物，只留下了通过一辆车的口子。一路上未看到一个人。

到沙坪坝时天才亮，我们就决定先到重大去问。到重大后果然我们的人都在重大学生宿舍休息，有的在烤衣服、烤火，有的在睡觉。去后也给我们安排了休息的寝室。在重大吃过早饭后才回到学校。

回来后听参加武斗的人说：去时在西农遭到8·26伏击，后被赶走了。秦××开空车打头阵，车上只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夏××。行至西农，秦××的车被拦住，挡风玻璃被石头打烂，他的脚还被玻璃打受了伤。都说秦司机还比较亡命。我还听说叶××说：他怕走后面，净超车走中间，说在双碑被军工的围到了，全靠八一兵团来了几千人解了围，还用麻布口袋扛了很多大馒头来我们吃，情景很感人。还听杨××说：有一个西师8·31的看到他们后以为是自已人便给他介绍情况，并说自己是8·31的，杨金华便几下就把他打倒了。有的人说杨金华确实有两下子。

增援长安八一兵团夺粮

（19）67年6月底，我第一次开车运送我校武斗人员到江北长安厂¹参加武斗，帮八一兵团夺回被反到底抢去的两车粮食。

由学校出发经过两路口、大桥²到长安厂。是由杨金华带队和指挥的。由我和建设³八一兵团毛××、卫校李××、我校秦××驾驶4辆解放牌汽车前往，

¹ 国营长安机器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456厂（重庆20信箱），位于江北区茶园。

² 指嘉陵江大桥：当时重庆唯一的一座过江大桥，于1965年正式通车。

³ 国营建设机床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296厂（重庆1信箱），当时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

大概 200 人左右。李××打头阵，我开第二。在 18 中留下了一个梯队，其余 2 个梯队乘车前往五里店。

行至长安厂附近，便发现前面有很多人阻拦。当李××冲过去时，我就看见被撞倒两个解放军，左面一个正被两人扶着离开公路。右面一个还躺在地上，有人正准备去扶。于是我立刻向左打方向盘，迈开了右面那个解放军，想冲过去。此时右面一个背着步话机的解放军和左面的一个解放军想前来阻拦，看我未停便闪退回去了。

接着不知是由于知道撞了解放军，还是前面阻拦的群众和解放军太多，李××忽然停车。见此情况我也赶紧停住并险些与前车相碰。这时车上的武斗人员都下车了，和下面的人群都集中到头一辆车去了，并步行前往五里店。杨金华便叫我开空车向后退，开进长安新厂去。

于是我就赶忙向后加速了一百多公尺开到长安新厂去了。进去时看见毛司机和秦司机的车已停在里面。隔了一阵，才见李××的车子开回来了，并载有十几个武斗人员押车。下车后，李××便和这些人一起，由长安厂八一兵团的人带着从厂的后门抄小路向五里店赶去。我们 3 人未去。

下午八一兵团的说，车子被夺回，没有司机，要机校去两个司机，于是我便和秦司机由一个他们的人带路从小路到五里店去。要到五里店了，在下山坡的时候，看到公路上我们的人已排着队往回走了，我们也就跟着回长安厂了。

在长安厂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开车从小路回到 18 中，再从 18 中冲过三钢延安兵团的石头封锁和阻拦回学校。回来后听说在五里店用钢钎戳死了反到底军工一个亡命的老头。

在袁家岗拼钢钎再次负伤

（19）67 年 7 月初，有天晚上，我校在杨金华带领下支援八一兵团攻打建设兵团（我未参加）。听说建设厂红大刀使用了汽油燃烧瓶。

第二天上午杨金华、夏高万、伍振友又带领我校武斗人员在袁家岗与驻重医的河校“航锋”、望江¹军工“金猴”、建设厂“红大刀”打钢钎。郭××、丁××（221 的）及建工校的一个学生在教室大楼造汽油燃烧瓶。开始我和刘××等几个女同学，把做好的燃烧瓶送到袁家岗给武斗人员使用。过后我也拿了一根钢钎到前面去了。双方冲过去冲过来不分胜负，对摔石头，我也向对方摔了石头。当对方向我们摔石头时，我没注意被石头打伤了脸，当时血直流。

建工校“鲁迅”战斗队的一个高个子同学就赶快把我背到了卫校，血流了那

¹ 国营望江机器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 497 厂（重庆 16 信箱），位于重庆郭家沱（当时属南岸区）。

个大汉一肩头都是。在卫校由重医附一院红工 815 一个姓杨的男瘦高个医生缝了 3 针，我就未再去了。

第二天为了造舆论，机校兵团全部出动，用医务室的推车推着我，列队到大坪、杨家坪游了一圈，高呼：砸派打人，挑动武斗！血债血还！

到解放碑打“财扒”

（19）67 年 7 月上旬，由 29 中与我联系，杨金华带队到城里去打财扒操哥¹，去了 4 辆车，由我和李××、毛××、雷××开车。是晚上去的，住 29 中，车子晚上停在红岩三中²，白天停在公安局。中午在外贸大楼吃的饭。白天武斗人员就三五成群的到解放碑去打操哥财扒，抢了一些反到底办的报纸刊物，冲走了一些在解放军剧院搞投机无线电零件的人³，有的还缴了一些零件。在城里闹了一阵后就回学校了。

打工业校和三钢

（19）67 年 7 月下旬，我校还参加了打工业校⁴，由杨金华带队，说是集体行动，开了 4 辆车，由我、毛××和黄桷坪搬装公司的两个驾驶员开的。晚上去的，先到化龙桥朝阳厂⁵，后由杨金华带去埋伏，和沙坪坝重大、八一兵团等组织联合行动。

我和吴××以及其他司机未去，晚上睡在驾驶室里，天亮听到枪声。在打工业校时双方动用了武器，听说还打死打伤了工业校的人，俘虏了一部分，我们这边也被打死 1 人⁶，天亮时拿下了工业校。我还看到八一兵团用小轿车运回了一挺重机枪，后由沙坪坝回校（此问题过去也详细交待过）。

（19）67 年 7 月下旬，我校由杨金华带队参加了攻打三钢延安兵团。晚上

¹ 财扒：方言词，指小偷；操哥，当时对打扮时髦追求玩乐的男青年的蔑称。

² 红岩三中：文革前叫凯旋路中学，在市中区凯旋路，其背后坡上教师宿舍的部分建筑，是小说《红岩》中描写到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办公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老街 32 号“慈居”）。因小说《红岩》的影响，文革中“破四旧”时，好几个学校争相要求更名为红岩中学，经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将沙坪坝区的童家桥中学更名为红岩一中，杨公桥中学更名为红岩二中（因这两所中学都在小说《红岩》描写的渣滓洞、白公馆附近，其所在地与小说中写到的某些情节有关），市中区的凯旋路中学则更名为红岩三中（文革后期又更名为五十三中）。

³ 实际上是一些无线电爱好者在相互交换或买卖用来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的元器件。

⁴ 1967 年 7 月 25 日，八一五派调动多路人马并动用枪支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工业学校，成为重庆两派动用枪支展开大规模武斗的标志性事件。

⁵ 朝阳厂：国营重庆朝阳电机厂，原为国营重庆无线电厂（代号 716 厂）的分厂，位于沙坪坝区化龙桥，后改名国营重庆微电机厂。

⁶ 重庆工业校 1967 年“七二五”事件中，进攻方的重大八一五被打死 2 人，八一兵团被土燃烧筒失事烧伤后抢救无效死亡 1 人；反到底派被土燃烧瓶击中烧伤后死亡 1 人，被打死 6 人（均为中学生，其中女生 1 人）。

由学校出发经两路口到六中，由我和毛××、李××及 242 文筹¹的一个驾驶员驾驶。第二天清晨把武斗人员送到对面大桥桥头，我们便开车回到团市委八一兵团团部。

晚上才打起来了。我们带了一挺重机枪，射手是林××、刘××。五一校带了一些小口径步枪。参加的还有长安八一兵团 20 团。后听说动用机关炮，天亮后，一女射手被打死。五一校一人准备用手榴弹去炸毁，反把自己的手炸断。

第二天早上我和毛司机正在吃早饭，看见吴××一人提着支手枪，叫赶快开车过去接人。想不到延安兵团枪多火力猛，攻不下来。我们的人在武装部抢了枪，怕解放军来了，我们便开车到桥头接回了学校的一部分人，一部分由伍振友带到长安厂去了。

到长江厂运子弹未成，回来差点压死人

（19）67 年 7 月下旬，紧接着到李家沱抢枪未成后，杨金华通过我校几个驻长江电工厂²同学联系，叫李××、雷××开两辆解放牌车到长江厂搞子弹（我未去）。

7 月 30 日下午，我在教室大楼前碰到 319 的杨××，他很着急的对我说：周文川，到处找你，快点叫毛司机一起开车，到火车站河边去接杨金华他们。他们坐车回不来了，要从长江厂过河，搞了很多子弹。但我有点怕，外面形势较紧张，知道反到底又有枪，又不知沿途如何，想推辞不去。

当时杨××就骂我怕死。我怕伤了自己的面子就心一横，鼓起勇气冒火的说：你怎么不去，你不怕死就和我一起去。杨××说：去就去嘛。此时我看见了吴××，就叫他准备和我一起出车（因吴××一般都是跟我的车，好用摇手柄帮我发动汽车，因马达坏了。同时他又有枪，多一个人胆大些）。于是我们就一同去喊了毛××一道去，他也带了两个跟车的人（有一个叫老班长）。

出发后毛司机比较狡猾，开车走的第一，我开车走的第二，因走第一发生情况容易冲过去，走第二容易倒霉。开到重医附一院时，发现拦车，当对方发现汽车阻拦时毛司机就冲过去了。于是就来拦我的车，还有几个持枪人员，并高喊：“停车，停车！”还向驾驶室扔石头，一坨干泥巴摔进了驾驶室，我们满身都是泥土。当时我怕对方开枪射击，便立即埋头加油冲，此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冲过后我便说：好险哟，如我被打倒，我们三个就完了。吴××说：是我打的，如果当时我不向外开枪，把他们吓得趴在地上，我们可能都完了。

天快黑时，我和毛司机把车开到了重庆火车站河边一趸船边的河岸边等候，

¹ 242 文筹：即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文革筹备委员会，属八一五派。

² 国营长江电工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 791 厂（重庆 63 信箱），当时位于南岸区铜元局。

直到天黑也未见有船过来。我们三人就上趸船向对方喊话，杨××还用红布蒙住手电筒用灯光进行联络，对岸也有时明时暗手电光回答，并听见对岸边船的马达声。

又等了很久还是没有动静，毛司机就喊：开车走哟，时间不早了，可能不会过来了。我们就商量了回去的路线，都认为走沙坪坝要经过李子坝、化龙桥比较危险，原路返校又怕重医知道我们从机校开车的两辆车要回去在附一院后门原地等候伏击。毛司机就提议先到团市委八一兵团总团休息吃晚饭，那里又有他们团的陈大炮¹负责后勤。于是我们就决定先到团市委，第二天早晨再回去。

还是毛司机走的头，汽车行至菜园坝到两路口的南区公园陡坡急转弯处，我便把吃的烟头向车门窗外扔出去，被玻璃挡回来掉在我身上。我就赶忙低头去捡烟头。此时便听到杨××、吴××喊：周文川，前面有人！注意，车子！我急抬头，在车灯照明下，看见车已向公路边开去。离车前面两公尺处，有一对男女还不知道，正并排慢步行走，女的在左面。我便急忙连踩急刹车带打方向盘，让过了才未压着，但被车右面叶子板和脚踩板挂倒了（杨××、吴××也是看到了的）。当时车子在路上横摆着，我就忙把车摆顺并起步走时，车灯射到了那个挂倒了的女同志，被吓得直往路边人行道上爬，并吓得呀呀直叫。我也未下去看伤着没有，赶忙开车去追毛司机。

在车上吴××、杨××都说：不是我们喊得快，好危险！并说可能是耍朋友²的，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后面。我还自夸说：你我³手脚好快，开车就是要手快、脚快、眼快，不然差一秒钟就要出事。

我们开到市团委后，毛司机已先到，并向毛××他们讲了这事，都说好危险，并找到陈大炮吃了晚饭，吃的盐蛋、馒头和肉。当时我和毛司机、吴××还把自己的手枪拿给在场的西师附中无产者的人观看。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开车回校，行至大坪时看到街上很多群众议论，并听到重医下面有枪声，才知下面打起来了。在下马家堡坡时，杨××吓得叫停车。我停了一下，看见毛司机前面已经开走了，就又开车追起，冲过 242 部队⁴大门后看见前面没有一个人影，电车线也打断很多，吊在路中，在附一院后门还冲过了拦车的水泥障碍物。

行至袁家岗被电车线挡住，我便减速问：晓得有没有电哟？吴××急忙说：

¹ 陈大炮：陈忠文（“陈大炮”是外号），1940 年生，文革爆发时为国营建设机床厂 43 车间工人，参加造反后任八一兵团 6657 团勤务组成员（分管后勤和武斗队），1968 年 6 月 15 日代表八一兵团到洛碛镇参加庆祝涪陵红联司成立一周年大会，其间出现腹泻呕吐症状，送回重庆后 26 日因中毒性休克（出血热）送第七军医大抢救，27 日凌晨因空回肠坏死、抢救无效去世。当时传说被下毒致死，但无实据。终年 28 岁。

² 耍朋友：方言词，即谈恋爱。

³ 你我：四川旧时底层社会（特别是帮会）人士的口头语，有“我”、“我们”、“你和我”等含义。后来一些人为表示自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或炫耀自己有“江湖”味，也喜欢以“你我”自称。

⁴ 242 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即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马家堡。该校主要由反到底派 242 红总（红色造反者总团）控制。

管他有没有电，快冲！于是我又加油向学校开。此时重医的 14.5 机枪¹已向我的车扫射，我们都吓得缩到驾驶室座椅下。我由于要开车，只抬着头，用眼睛从挡风玻璃边大概看到前面公路加油冲，并看见带光的曳光弹直从车前和驾驶室门窗对穿飞过。开到校门时大门未开锁，人也跑了。我急忙煞车，差点碰到毛司机的车。车横在路上，叫人开门后，我们就回到了学校。回校才知杨××把我唯一的一颗手枪子弹乱打掉了。

第二天，8 月 1 日，杨金华才带领李××和雷××开着两辆车回来，在教室大楼门前下了几万发步枪和机枪子弹，一挺偷长江厂八一兵团的五六式轻机枪（听杨××、邓××、郑××说是走时偷的）。八一兵团只给了我们几千发子弹，其余是他们到车间找私人给的（也是听他们讲的）。

1967 年 8 月初从学校撤退那天的经过

当天上午我在教学大楼底楼大门进门的左手边的垫子上睡觉醒来后，约九点多钟。看见 20 中的来了一个学生，说要找杨金华要人过去支援，他们已经守不住 3 号阵地退到 4 号阵地²来了，情况紧急。并说他们的人一直没有睡觉吃饭，还埋怨说：杨金华昨天约好了的，说我们守不住了发生紧急情况打信号弹，你们这边就过来人支援。我们打了几次，你们这边都没过来人。

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孙庆玉³、夏××、李衡⁴、廖××、张××和两个外校的人。都是听后大家都很着急，都问：杨气功⁵（指杨金华）到哪里去了嘛？当时孙庆玉站在教室门口生气地说：气功、气功、气功在楼上睡觉。当时大家都非常气愤，衡三宝⁶气得大骂：杨金华是个怕死鬼，每到危机时他就躲了，只顾自己睡觉人都找不到。孙庆玉上楼去把杨金华喊下来后，大家都催他看怎么办，他却不说话站在教室大楼门口独自想什么。当时大家对他很不满，我和李衡便催他说，那边情况紧急，快点，先去看一下情况嘛，万一失守了就完了，去一点人也多点力量。

在大家的催促下，杨金华便带着我和李衡、张××、衡三宝、夏××、廖×

¹ 指子弹口径 14.5 毫米的高射机枪（用于打飞机），当时刚试制出来不久，尚未大量生产，重庆武斗中被多次使用。

² 这是当时八一五派武斗人员给所在地区几个小山头命名的代号。

³ 孙庆玉：女，1948 年生，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工 204 班（68 级）学生。八一五机校兵团成员。1967 年 8 月 4 日随队撤离学校路上中弹身亡，终年 19 岁。

⁴ 李衡：1947 年生，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机 307 班学生。八一五机校兵团成员。1967 年 8 月 18 日上午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时中弹身亡。终年 20 岁。

⁵ 因杨金华从小练武术，有人说他会气功，就给他起了个外号“气功”。

⁶ 衡三宝：1949 年生，文革爆发时为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工 106 班学生。八一五机校兵团成员。1967 年 8 月 18 日凌晨担任尖兵班长率队向潘家坪附近五台山高地搜索前进时被占据五台山的反到底派认出，胸部中弹身亡。终年 18 岁。

×、和外校的两个学生一起经过学校篮球场，从学校大操场围墙的断墙口出去，进卫校大门从左面传达室旁边大路赶到了上面的卫校家属宿舍后面，20 中的人都在这里，有的人还爬在宿舍后面的土坎上和红石谷子坎上向着已失守对面有一颗树的 3 号阵地射击，正在掩护前边阵地的人和机枪向后撤出来。他们见我们去后，都说坚持不住了，向杨金华说要求撤退，如再不撤，退路都没有了。因他们的伤亡也大，都坚决要求撤退。由于他们没有睡觉，眼睛都红了，我们去了后就把枪给我们监视 3 号阵地和掩护前边机枪阵地的人撤出来。他们把枪给我们去的人后，有的人由于太疲倦，就躺在屋角边的地上睡着了（记得好像当时我校 221 的邓××也在场）。

由于大家的要求和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利，杨金华独自思考了一阵就叫张××回学校通知学校的人准备撤退¹。记得当时 20 中一个大家都说他是比较亡命的学生，竟发气的端着枪站在土坎高处，暴露了全部身子向 3 号阵地射击。当时大家都说：你不要命啦，把他拉了下来。劝他冷静点。过了一会杨金华叫我们守住阵地，等后面的撤了再撤，就走了（不知是回学校看情况，还是到卫校指挥部²去了）。前面阵地的人不知是怕死还是怎么的一直撤不出来（因撤出来要暴露全部目标，还要跑一段路）。过了一阵才扔了一个送饭的桶出来，跑过来一个人。这时阵地下边（和 3 号阵地之间的山沟里）的农民院子上来一个人说：在他们下边房子里还有二箱子弹，和几书包子弹，我们的人走时没拿走，叫我们派人去领。当时大家都不作声，没人敢去，因去要下一坡石梯，正对 3 号阵地和通过下面一段开阔地。过了一会，李衡就当着大家叫我说：周文川，我们两个去。当时我很怕，但又怕别人说我怕死，就硬着头皮同意了。去时我一再叫上面的人多向 3 号阵地打枪掩护。我便和李衡跑步赶到下面农民院子，在一间房里床下拿出了子弹，一人背了一书包扛了一整箱往回跑，由于很重，上石梯时累得简直走不动，是爬上去的。回到原地我躺在屋边地上睡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疲劳。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通知说后面的人撤了，叫我们撤。于是大家就掩护一个人到前边阵地战壕里帮助里面的两个人把重机枪连同枪架一起撤了出来。走时每人都尽量多带子弹，把一些重大造的土手榴弹扔进了旁边一个下水道洞里。重机枪把枪架取了不要、扛走。当时还有一个外校的人看到扔了可惜了，要拖着枪架走，我们都劝他，不要拖，算了，拖着走是个包袱，现在逃命都顾不得，但他仍坚持要拖。这时人都先后经家属宿舍向石坪桥那边撤走，我也急忙扛了一铁

¹原由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掌权的兵工企业建设机床厂，在 1967 年 7 月初被反到底派抢先占据了厂生产区，当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工业校的“七二五”事件发生后，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将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取出分发下属组织用以“自卫”。8 月 1 日，八一五派革联会作战司令部决定组织多路人马向建设厂进攻以争夺枪支。8 月 3 日两派展开争夺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的血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死伤累累。八一五派终因武器劣势而战败，于 8 月 5 日前后陆续撤离杨家坪地区。

² 即设在重庆卫生学校的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

盒子弹，和 20 中一个背驳壳枪的瘦高个子的负责人及李衡、张××、夏××等人（记得有两个建工校的），穿过家属宿舍经卫校食堂向石坪桥方向撤。

行至卫校学生宿舍后面的厕所附近要下坡时，碰见了杨金华和卫校指挥部的詹天明¹及两三个不认识的人。当时怕走操场危险受到 3 号阵地的射击，前面的人就带着下坡顺着坡下竹篱笆圈圈横穿过公路，走公路另一边的路基下边。当走到公路这边路基下边时，不知谁发现上面一个木棒上挂着一个钟（农民上班敲钟用的）的小山堡上有人了，就喊了一声：上边有人！我们都急忙趴在旁边长满荷叶的藕田里（那时杨金华和詹天明是走在中间，我走在最后，前边是建工校的一个学生）田里的污泥又稀又烂，当时也不顾了。我当时感到左脚非常痛，以为是挨了一枪，我急忙用手摸又没见有血，才知道是刚才吓得慌忙趴下时脚扭伤了。当时眼镜也在趴下时摔烂了一个镜片，另一个镜片也搞脏了，一只眼睛也看不怎么清楚了。我想，这回可能完了，如被发现一个都跑不脱。趴在田里不敢动。

突然前边一个建工校的说：他们前面的都跑了，也不管我们，他们还有机枪也不掩护，各顾各……我抬头看，果然其前面除了他外都不见人了。我急忙对他说：不要叫，自己往前爬，跟着他们走的地方走。于是他就在前面爬，我在后面爬，由于脚很痛爬得很慢，不注意手枪掉进了稀泥里，我就伸手到身子旁边田里摸，摸出后我才发现前边那个人也不见了。当时我也慌了就用力朝前爬。爬到前边田角时看见田角是个田缺口，下边是一个水凼，旁边是公路下边的一个排水洞口，我就滚进水凼钻进了洞子。我急忙顺着洞子从另一端爬出来，是卫校操场旁的一条小溪沟，两边长的是夹竹桃，爬出后，我就忍着脚痛弓着腰顺着沟爬，并看到沟里已经有人走过，扔了鞋子、包包、烟等物在沟里。爬到操场另一边的溪沟时前面又有一个小水洞。由于我单身一人，又不知情况怎样，也不知前面的人到底是从哪里跑的，眼镜摔坏了，又看不清楚不敢乱跑，就往小水洞里钻，里面很脏很窄，我也不管。从另一端爬出后，我准备再往前走，这时外面枪声不断，再往前走也容易被发现，就赶忙退回了水洞，并在洞里把枪管里的泥沙洗掉。我当时想不能再走了，等天黑了再说，这样也安全些。

但是长时间趴在阴暗有水的洞里也吃不消，当时脚和手的皮肤都被水泡白了。我估计也可能是一点钟左右了，离天黑还早，就爬出去在洞口边横躺着，让没被洞口边上的竹林和夹竹桃遮住的阳光晒一下。刚晒了一会，我听到了很响的连发冲锋枪声，声音很近好像就在洞顶上。我估计可能这一带是被反到底占领了，在洞子旁边有两个防空洞的小土堡上向石坪桥方向射击。但又怕反到底的顺操场

¹詹天明：文革爆发时为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工人。文革中任空压厂八一兵团勤务组成员，1967 年夏武斗中任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武斗指挥。后因 8 月 2 日空压厂武斗中烧毁厂俱乐部事件，8 月 3、4 日在该指挥部驻地卫生学校连续发生枪杀对立派俘虏 3 人事件（其中一女生被枪杀未死侥幸逃脱），于 1969 年被捕，以“武斗杀人”等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1984 年 12 月刑满释放。

和旁边洞子上面的小路找人过来了，就急忙退进了洞口并靠在右边洞壁一边，我怕浑水流出被人发觉，就一点不敢动，一会儿清亮水就流出去了。这时我洞口上有脚步声，就赶忙把手枪子弹上膛，心想如被发现只好拼了。并偏着头看见从洞口上边小路上跑过去的人的脚杆，并听到跑过去的人在大声说话，仿佛听到开始几句在说：“跑了跑了……”后来就听到两个人的说话的杂音。隔了一会儿就没有听到动静了。也不知哪派的人，估计绝大多数是反到底的人。所以我还是不敢出去。

我就在洞子里又等了约一个多两个小时，听到了后面公路上有坦克车和装甲车的声音。我怕是反到底的占了空压厂¹把坦克开出来了，所以还是没有出来。一会儿又听到坦克向石坪桥方向开走了的声音。我在洞里又等了一阵，又听到了很响的坦克车声音从公路上开过去和停在公路上时的发动机声音。我就估计可能是我们的人打回来了，决定爬出去看一下。于是我就在洞里面困难的调过头来，向后面朝公路一面的洞口爬出来……出来后我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双手端着一个小梯锅从公路那边向这边小路走过来。等她走近后我站在沟里问她是不是八一兵团来了？当时她说可能是。我就胆大些了，走出溪沟顺着操场边的夹竹桃向公路靠近。

这时公路上的一个人发现了我，跑下来，用手枪指着我问：是哪里的？我也用手枪对着他问：你是哪里的？他又问你是不是机校的？我就说：是机校的，没撤出来躲在洞子里，差点完了。当时他听说是机校的，脚又一拐一拐的以为受了伤，就急忙把手枪收起（他看我穿的劳保服也估计是机校的），走过来扶我，并说他们是重大 301²的，听到机校危急后就赶来援救的。并问我，哪里还有伤员？我说：不晓得，我躲在洞子里。他把我扶上公路。公路上停着两辆解放牌汽车，就叫我坐车。开车的人说，现在不开车，等一阵看还有没有伤员。我看见公路斜坡顶上停着两辆坦克，停在公路左边的小山堡下没再向前开。卫校操场上有人分两路向卫校摸去。我见车子不开，自己就步行一拐一拐的向石坪桥走。半路上看见公路边一个尸体，可能是撤退时被反到底封锁打死的。

到了石坪桥一建兵团，我就去找学校的人，一问都说：机校的人又打回学校去了。这时有几个一建兵团的中年人问了我的情况和看了我这副样子，就很热情的叫我把衣服脱下来他们拿去洗，叫我吃饭。洗后放在门口的万年青上晒干。我光着身子用水把枪洗后，他们又找油在旁边车房里帮我擦枪。等了一阵，衣服晒干了，我拿来穿好。并在一建兵团大门口看见了钢校 815 的一个腰上挂了一支小白朗宁手枪的负责人。他见我脚严重扭伤筑了气，便一直扶着我。后来坦克开回

¹ 国营空气压缩机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 256 厂（重庆 2602 信箱），当时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

² 重大 301：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专事校外武斗的队伍，称 301 野战队或 301 部队。在 1967、1968 年的大规模武斗中战死 17 人，被俘后拒绝举手投降被枪杀 1 人，重伤致残数年后死亡 1 人。

了石坪桥，并听从机校过来的人说，前边情况很紧，反到底武器太好，我们的人伤亡很大，需要支援等。并看见有的单位撤下来坐运伤员的车走了。当时石坪桥指挥部的张司令在路边走来走去没办法。我就找他搞一辆车子，我和钢校扶我那个同学到七医大找红总求援兵。但他生气地说：现在哪里去搞车子哟！扶我的那个同学也劝我到七医大好好看一下脚。于是我和他就搭了一辆到七医大的车到七医大去了。那时大约 4 点多钟。

补充 1：在我从卫校 4 号阵地撤退到卫校学生宿舍后面厕所附近和杨金华等人碰到后下坡时，我看见了在卫校大操场靠卫校石灰篮球场圆弧跑道上，趴着一个上身穿红运动衣的人¹，估计就是前两天被抓进我校的那个重医的侦察员。因在撤退前两天的下午，我在学校教学大楼的门前看到很多人围着一个穿红运动衣的年轻人，说是抓到一个重医的侦察员。那人本人也说：他是被空压厂八一兵团抓后放出来的，求大家把他放了。记得 105 班外号叫“肺病”的当时也在场。我校指挥部的詹天明好像也在场。当我听到有人说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时，我就走了。那天在场的人很多，有钢校的、电技校²的和建工校的。记得第二天我听“肺病”说：那人在我校枪毙了，由于怕负责是很多人一起打的。有的拿手枪，有的拿小口径步枪，开始说是放他，那人还很高兴，放后到了我校操场离了几十公尺，放的人就向那人射击，那人吓得求情，但去的人一齐开枪就把他打死了。我估计他是参加了的。在（19）68 年 12 月份，杨金华回校来玩，在教学大楼徐×寝室里，“肺病”也谈到此事说：他没参加，当时有人找他借手枪他没借，主要是电技校的人干的。

补充 2：在撤退那天我从洞里爬出后遇到的重大 301 的把我扶上公路的那个人，过后就记不得了，认不得了。但是在（19）68 年，有一次到人民大礼堂观看《8·15 风暴》时他主动认出了我，并谈了那天救我的事，我才认识了他，他说他叫王九昌，还叫我去耍。后来我还到他那去耍过。并听重大 301 的其他人说：他是无线电分团的。

（1969 年 2 月 27 日交代中的有关内容）

在（19）67 年 7 月份³我看见抓住一个人，说是重医侦察员，被一群人押到卫校操场枪毙了，105 班外号叫“肺病”的说：是建工校、电技校的打死的，当时还有人要他借枪，不知他去没有。是在杨金华从德阳回来在教室大楼徐×寝室

¹据了解，此人名叫刘海泉，男，重钢第六子弟小学学生，反到底派，被杨家坪地区八一五派当作“探子”俘虏后于 1967 年 8 月 3 日在卫生学校假称释放后乱枪射杀。

² 电技校：重庆电力技工学校，位于九龙坡区黄葛坪。

³ 应为 8 月初。

里玩，讲到这件事时，“肺病”才说的。那时还听说是卫校指挥部的负责人詹天明同意了（这人是空压八一兵团的负责人，又是杨家坪地区指挥部的负责人，指挥部设在卫校）。

当时还讲了撤退时枪毙了3个人的事，夏高万说：有人栽赃，没有我参加，我是最后一个人关了教室大楼铁门才走的，根本不知道。杨金华说：“我从卫校阵地撤下来时看见了有3个人¹被绑着打死了，有一女的未死在呼吸²，有人说要补一枪，我叫他们快滚，还说是谁干的？”我未看到。

我那天是和杨金华他们一起从卫校阵地上撤下来的，我还扛了一箱子子弹，开始没与杨金华走在一起，在卫校学生宿舍后面我才碰见了杨金华，还有那个指挥詹天明也来了。他们都跑脱了，我走在最后躲在一个水洞里，等我们的人打回来后才出来的。

这件事我怀疑与那个指挥詹天明有关，在杨金华发现被打死的人后，在学生宿舍还碰见他撤退。此事是否有他参与和知情，我很怀疑，并且他那时又是武斗指挥，很多事情他知道。

再打煤校扑了空

（19）67年9月中旬³，我校已由学校撤到七医大住下，有一天七医大红总到中梁山运煤，结果经过煤校时遭到煤校830袭击。七医大红总就决定攻打煤校，拔掉这颗钉子，并叫我校一起参加。

当天下午由于杨金华、夏高万不在，彭期远就叫我和钢校的一个负责人参加红总的会议。到了红总团部由红总作战部一负责人画了地形图，叫我们晚上在煤校通中梁山附近的公路找个地方守候，防止煤校的逃跑。一部分人守煤校大门对面公路正面阻击。他们自己担任主攻，从煤校后面山上压下去，天亮后打响，并说以打信号弹为准。杨金华回来后，我就把情况对杨金华讲了。

天黑后由杨金华带领我和衡三宝、郭××、夏××、土豆（外号、203班的）郑××等人，与钢校的几个人，建工校“鲁迅”的王××等十几个人先乘李××的车在凤鸣山车站下来步行，到煤技校找人带路，走小路，在煤校左面通中梁山煤矿的公路左面山坡上一红砖宿舍，下面挖了掩体并架上带去的一挺重机枪守

¹ 应该是8月3日枪杀一人（即重钢六小学生刘海泉），8月4日枪杀二人（北碚天府煤矿工人姚代文，西南农学院学生王兰英）。

² 她是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学生王兰英，反到底派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勤务组成员（分管后勤），1967年7月底与北碚反到底派人员乘车路经石坪桥时被八一五派哨卡拦截俘虏，关押于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卫生学校内），8月4日八一五派撤退时押出枪杀，中弹未死，得农民救助逃脱。后被安排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碚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³ 此时间可能有误，据杨金华回忆是8月7日左右，且文中提到的衡三宝，已于8月18日在五台山战斗中阵亡。

候。还用石头打熄了公路上和房角边的路灯。夏高万带了部分人在煤校大门对面守候。

那时我们发现煤校后山上有电筒灯光时明时暗，估计是煤校得知情况跑了。我和衡三宝都主张去追，但杨金华说地形不熟不愿去，也不同意。当时我和衡三宝发牢骚，衡三宝大骂杨金华怕死，并说：老子今后回家了（因衡三宝打仗很亡命，杨金华都怕他）。后杨金华带了几个人到公路对面去看了一下又回来了。

天亮后一直未见动静。电机厂的人还给我们送来了稀饭和馒头吃了早饭。天亮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见煤校后面山上，穿军装的红总持枪人员下来进了煤校。又过了一阵才听见里面稀稀落落的几声枪响，并发现房顶上有人取喇叭，同时看见有几个人在煤校围墙下打了个洞进去了。杨金华便说我去看一下，就走了。

等了一阵我看没什么动静，并发现里面有人在走动，也说你们等一下，我也去看一下，就过公路从那个洞里进煤校了。进去后看见七医大红总的人背着枪在休息，说煤校 830 的晚上跑了，并说附近农民讲的。

走到煤校食堂时我看见七医大红总的汽车正在运粮食及汽油等物品，还运走了前不久被煤校抢去的七医大的印刷机械。当时我碰见了杨金华，他看到有人在



抢东西，就喊不准拿东西。我还看见一些外单位的武斗人员（不认识）及有的农民在宿舍抢东西。后我碰见夏高万等人，并听家属说：当晚 830 的人晚上撤走时，把枪藏在家属家里，就一起到附近铁路旁的家属宿舍，搜了两家人的厨房。并听家属说：当晚 830 的就从铁路边山上跑了。于是我和夏高万、衡三宝等人就走了。（左图：2013 年春节，周

文川在武斗中死难的衡三宝等同学墓前焚香祭奠。墓基上原有铭刻着“烈士”姓名的墓碑，已在八十年代初被机校领导人以“清除文革遗迹”之名派人砸毁。）

在 421¹误伤纺织兵团的人

（19）67 年 8 月，我从家里回到七医大听陈洪明说：在潘家坪²打了一仗，

¹ 指总字 421 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位于沙坪坝区歇台子。该校由八一五派红色造反兵团控制（反到底派红色造反纵队逃离在外）。1967 年 8 月中、下旬八一五派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时，前线指挥部设于该校。

² 潘家坪高干招待所：重庆当年最高规格的宾馆（今渝州宾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西哈努克亲王等到重庆时都曾下榻该处。1967 年 8 月 18 日至 20 日，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障该区与市

我们死了7个人。

在我赶到前线的当天晚上，我们学校已经撤下来了，在421操场休息。隔了一阵，杨金华叫有枪的人集合，说我们这里的人很复杂，发现混进对方的人，叫等会儿指挥部派人带我们去抓。后又说情况不确实，算了。当时在离我们不远处，靠大字报栏旁的地上，坐着几个约50来岁的老同志。我走过去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说是纺织兵团的，身边放了两挺带脚架的机关枪，一挺是从上方装弹夹的捷克轻机枪，一挺是上装圆盘弹盒的轻机枪。我还说，这种机枪是电影《上甘岭》张连长使用的那种机枪。其中一位老同志就说，我就是上过朝鲜战场打过美国鬼子的，听后我心中对他肃然起敬，就离开他们回到我们休息的场地。

过了一阵，指挥部副总指挥带着20中的人冲向这几个人，叫他们不要动，举起手来。话音刚落，不知谁开了一枪，我们和20中的听到都慌了，赶快散开，向这几个人开枪，一时枪声大作。很快枪声停了下来，现场异常沉静，我这才反应过来，高喊不要打了！不要开枪！第一个冲了过去，看见大字报栏都打垮了，压在这几个人身上，弄开后一看，死了三四个¹，重伤一个，就是纺织兵团的几位老同志。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看见子弹击中人体（胸部），表皮留下一个很小的洞，未见流出鲜血，地上也未见血迹，但人已不出气，死了。

20中的人马上把副总指挥和另一个人抓起来了。杨金华当时说：这里不能久留、太混乱。就带我们撤回了七医大。后来听说20中的人把那个指挥交给了纺织兵团。那个指挥姓胡²，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我不知道，可能杨金华和20中那时的负责人知道。

我们在七医大住了一个时期，编成班、排、连，经医大红总负责人李双箭³和八一兵团汤司令⁴（野战司令）鼓动一番，又回到421和党校守阵地。那时指挥

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许多房屋被毁。另据重庆市博物馆记载，文革前“刘少奇来渝时，按上级要求提出馆藏珍品到潘家坪招待所作布置陈设，‘文革’开始后，未及时收回，1967年被武斗组织抢去碧玉香炉等珍贵的文物10件，当时估计损失127.5万元。”（《重庆市博物馆大事记》，载《巴渝文化》（第二辑），1991年3月第一版483页）

¹ 这几个死者都是重庆印染厂工人，安葬在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里的有（据陈晓文等于1991年底抄录墓碑上文字记载，现碑上文字多已风化难认）：胡炳志，保全科工人，终年34岁；陈云信，动力科工人，终年49岁；李德才，漂洗车间工人，终年不详（墓碑文字风化）；胡中华，动力科工人，终年29岁；冷恒清，供销科工人，终年36岁。

² 胡某：名字不详，外号“胡胖子”，据说当时是五冶（一说为十八冶）公司中层干部，在八一五派潘家坪前线指挥部任副指挥（指挥是重大学生秦安全）。因误会发生八一五纺织兵团被枪击死五人、伤多人恶性事件后，被纺织兵团绑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要求枪毙，被“总司令”阳增泰制止。后被纺织兵团人员押回去痛打后释放。以后情况不详。

³ 李双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校史上写作李双剑，文革爆发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245部队（第七军医大学）学员，参加造反后任七医大红色造反总团主要负责人，曾任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8年9月10日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副主任。以后情况不详。

⁴ 汤少成：文革爆发时为国营嘉陵机器厂12车间工人。复员军人（原为从国民党部队加入解放军部队的“解放战士”）。参加造反后任八一兵团2301团武斗队负责人、八一兵团总部野战司令部（设重庆师专校内）负责人。1968年中央“八一五会议”上因“武斗杀人”（涉嫌主使枪杀了嘉陵厂八一兵团内部一对所谓“内奸”夫妇）问题受到清查，被关押审查多年。后病故。

部的人全换了，都是 421 部队红色造反团的军人。杨金华当了副总指挥，各连、排的指导员和正连、排长都是 421 派的军人。周家喻¹还来给我们做了形势报告，后来天气冷了，每人还发了运动衣运动裤。

(19) 67 年 7、8 月份，七医大红总还派了一个排的武装人员到我校，并在 20 中后面的高地上被对方打死两人，有一个名叫李忠良²。我从学校撤出后，由于脚扭了气，没有第二次打回学校，就和钢校一个学生到了七医大，在红总团部反映情况时，他们还拿出了绘好了的建设地区军事图来看。李双箭还准备亲自上前线，但被旁边的人拉住了。过了不久前线的人全撤下来了，他们的人也回来了。当时的总指挥部设在师专。我校撤下来先住在重大后又转到七医大。

在七医大住那段时间里，我们学校（机校联合指挥部，包括钢校、电技校、建工校的人）还去支援过港口兵团，并在城里打了交电公司³，我没有去。当时听回来的人说，交电被我们用信号枪打燃的，谁说的记不起了，因那时很多人都在讲，我班吴××就是那次在城里打交电时受了伤，后在港口养伤，他可能知道。

242 警卫连把好枪全拉走了

(19) 67 年 10 月中旬，“九五”命令后，两派根据两派签订的停战协议就地封存武器，我校当时在歇台子党校，封存在连部并点了清单上交。但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其他地区都在转移枪支以防后路，我校也就在一天晚上把封存在党校连部的全部好武器，装进一口大棺材，由不知是李××还是雷××开车运到七医大我校后勤部去了（在七医大新修的外科大楼二楼），当时我也参加了转运，记得还有夏高万（连长）、伍振友、吴××、邓××等人。于 10 月下旬又从七医大运回学校，好像是雷××运的，放在学校哪里我就知道了，是保密的，只有杨金华、郭××、吴××等人知道。

由杨金华选了一些好枪（如：2 支胶木柄的半自动、一支冲锋枪、一挺五六

¹周家喻：文革中一般写作周家喻，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大学无线电系 68 级学生，共青团员。文革中 1966 年 8 月参加造反，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成员，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后为红卫兵重庆警备区）主要负责人。1967 年底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主任。1968 年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7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1978 年 2 月 11 日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被以“‘四人帮’在四川的代理人、帮派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逮捕。1982 年 1 月 19 日被重庆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刑满出狱后一度经营私营企业。

²据《第三军医大学志》记载，该校（七医大）在文革中“有 3 名学员、1 名干部死于武斗和数人伤残”，根据现有资料确认，这 3 名学员是：李忠良、王正钦、雷盛凤（女），1 名干部姓名不详。

³指 1967 年 8 月 11 至 13 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交电公司楼上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机校杨金华任前线指挥。因交电大楼下铁栅门紧闭无法攻入，派去炸门的二人均在接近大门后中弹身亡。杨金华下令集中几支信号枪从马路对面八一五派占据的东方红电影院楼顶向四楼一底的交电大楼顶层窗内齐射，13 日晨 6 时将其室内易燃物击中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烧至紧邻的化工原料公司、针纺公司等处，整幢大楼被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事后当局曾以“自行纵火烧毁交电大楼”罪名将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站长何汉瑞（重庆无线电厂工人）关押审查多年。

式机枪、一支全自动步枪)，和 242 警卫连¹联系好，在一天晚上，由 242 警卫连一军人乘一 242 军车（嘎斯 51）从学校学生食堂运走了。当时杨金华说：注意不要被红总的抢了。那个军人说：警卫连的车他不敢，并拔出了手枪，就开车走了。后吴××的手枪也拿去保管了。（19）68 年 3 月份我陪吴××去警卫连找周班长要回来，那些武器杨金华多次去要，警卫连一直不还。

驻扎江北石（门）盘（溪）地区

我们撤出学校后，先住在重大后又住在七医大。由于我父亲病危并瘫痪了，母亲又怕我在外出事，就天天跑来叫我回家。回家后潘家坪大规模武斗就打响了，我就未参加上。

后来只是去守过一段时间阵地。有一天我看见建设厂八一兵团的两个人抬着一个尸体在党校一带埋了，听他们说是枪毙的一个铁杆反到底，人我不认识，在党校的其他建设厂的人可能知道的。

中央调查团到了重庆，“九五”命令下达后，我们就返回了学校。回校后不久，团部就调我们班再到江北石门织造厂²去，说是去顶生产，因为反到底派的工人跑了。主要是去帮他们搞武卫，因为他们女同志多，老头多，光挨打。

（19）67 年 12 月份我们班十几个人正式到了织造厂，由吴××、胡××负责。我们开始去的一个多月都是全天劳动的。（19）68 年 1 月下旬的时候，石门民中红中司尖刀战斗团和江陵厂³的反到底派回来了，“尖刀”回来后经常抓人搞摩擦，局势较紧张。厂里纺织兵团的负责人张××和吴××、陈××就叫我们脱产护厂，那时只有我和吴××有两支手枪。

记得在 2 月初的一个晚上，盘溪造纸厂三车间的 815 负责人朱××打电话来叫我们，说猫儿石总厂出事了，要我们去。我们就与轻技校⁴、搪瓷厂⁵工中⁶的学生开他们的车去了。到了后才知道一个反到底派的人扔手榴弹炸死了 815 一个听广播的人。总厂的人就叫人领我们去抄他的家，但那人已经跑了。

有一次我们听说盘溪街上“尖刀”的杀到搪瓷厂负责人的一个小孩，就在吴××的带领下冲到街上与“尖刀”打起来了。“尖刀”有一人被吴××打中了屁股受了伤。我未敢朝人打。在“尖刀”占了高地后我们怕吃亏就撤了。后来又回

¹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后勤工程学院）当时分为两派，反到底派是红色造反者总团（红总），八一五派是文革筹备委员会（文筹）。警卫连倾向八一五派。

² 织造厂：即重庆织造厂，位于江北区石门。

³ 国营江陵机器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 152 厂（重庆 65 信箱），当时位于江北区大石坝。

⁴ 轻技校：早期为轻工业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1960 年定名为重庆市轻工业学校，校址在南岸区。文革武斗期间有一部分八一五派学生住在江北区重庆搪瓷厂。

⁵ 搪瓷厂：重庆搪瓷厂，位于江北区石门。

⁶ 工中：指工厂自办的中学。当时提倡“两种教育制度”，除国家办学外，一些工厂自办工业中学，农村自办农业中学。

到学校拿了4支步枪，织造厂又给了我们几支独角龙¹。

又有一天我们在织造厂茶园吃茶，有一人从盘溪跑回来报信说，搪瓷厂的炊事员被“尖刀”的抓去了，我们就坐永安厂²的汽车赶到了街上。他们见我们有步枪，抓起人就跑了。我和吴××、张××占领了公路边的高地，就向押炊事员的两个人开枪，此人才被救了回来。我们还向距我们200多公尺的在水田里朝江陵厂新车间围墙跑的两个人开了枪，当我对着一个人的腿射击后，这个人倒下去了，爬起来又跑，后来听说确实打中一个人的腿。

那段时间里我还带着轻技校吴××、唐××等，在盘溪茶馆里抓了一个江陵41车间工人进行了逼供，是41车间一个姓刘和姓田的人点的水，说他是军工侦察员。后来放了。

在（19）68年3月份的时候，团部说学校需人，建设厂吃紧，我们就回校了。回校后我们在建设厂搞齐了枪，每人一支有多。由于江北石（门）盘（溪）地区各单位一再要求团部再派我们过去，于3月下旬又回到了织造厂。

这时石门地区已由附近几个单位成立了“地区指挥部”，指挥部负责人姓袁，是永安厂的。我们也属他指挥，也可自己活动，但要告诉指挥部，以防误会。有一次他说接上级李光头通知叫我们晚上到盘溪去伏击“军工”的汽车，结果差点把解放军打了，原来车上坐的是解放军回通用厂³。

我们还到江北农场⁴去了两次，一次是由农场五一纵队负责人王××带领，在晚上摸上山去，向山下场部的反到底进行示威射击，给他们壮胆。但在半路郑××连人带枪被他们抓去了，第二天才发觉少一人，又赶回农场，由解放军调解要出来的。第二次是王××派人来告急，说头天晚上对方摸过来扔了颗手榴弹，砸坏了房子，威胁大。吴××就派我和李×、胡××与轻技校的三牛等6人连夜赶到了。第二天反到底占了高地，用话筒在我们下面乱骂，三牛和唐××要打，开始我和胡××不同意。后来我叫他们打脚，不要打死了，开枪后他们全部都吓得趴在地上。不久就回农场场部吃饭去了。

吃过中午饭我们抢先占了高地，并向距我们四五百公尺的场部射击，他们也还击了。我们每人规定打了6粒子弹，下午便撤出了农场，还借了支枪给他们。不久王××就过来说：他们的那个红鼻子转业军人一枪打死了一个反到底的人（这人是部队上的特等射手）。

那时我们还经常出去巡逻，撕大字报，还和轻技校的人为了了解清楚某情况到家里去抓了“尖刀”的一个人，讯问后打了一顿放了。有时是吴××有时是地

¹ 指只能上一发子弹打一发子弹的自制土手枪。

² 永安厂：原名永安电瓷厂，1966年定名重庆电瓷厂，但人们习惯仍称永安厂，位于江北区石门。

³ 通用厂：重庆通用机器厂，位于江北区石马河。

⁴ 江北农场：当时重庆市农垦局下属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位于江北区石马河。

区指挥部姓袁的，带领我们晚上摸到盘溪变电站高地，向江陵厂新厂军工驻地和八村高地的房屋亮灯的地方射击示威。那时说八村的家属已经逃完了，剩下的只是武斗人员，房顶布置有沙袋。

我们于4月底5月初这段时间被团部调回学校，还留了些枪给织造战斗团。回校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了进攻煤设院和重医，我们班的杨××就在这次战斗中受了重伤，我是开车送伤员，没有参加。

一上三汇坝¹

(19) 68年6月上旬，319班杨××和三汇坝的人有联系，到我校319班搞武器，有一天杨××叫我和吴××去吃饭喝酒（三汇坝的人带下来了很多肉、酒、烟等物质，由319的赵××等到附近农民那里加的工），我和吴××去时已坐满了人，地点在四幢二楼刘××寝室。在座的有杨××、刘××、赵××、罗××、孔××、邓××、吴××等人，重医附一院红工负责人周××、还有3个三汇坝的人，杨××作了介绍，现我只记得其中一个40多岁的中等个子人，都叫他张书记（里面掌火²的）是三汇坝某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杨××介绍的什么革委会我记不得了），他还向我们敬了酒（这人很会外交、会说）。并介绍了他们那里的困难情况，要求支援点武器。并说我们带来了很少的一点东西（指物质的）作为互相支援。重医附一院的老周（周××）也敬了酒讲了话。

饭后，杨××找我和吴××搞点武器，我们说没有，我就给了一个步枪木托，并开罗××的车回家，把我私自没让家里人知道放在家里的一颗土手榴弹拿来给了他们，还给了一颗织造厂吴××送我的军用手榴弹。319班杨××、刘××等人帮三汇坝的人搞了三支步枪和一些半成品枪管等物。并要求我开车把武器运到三汇坝，同时送他们上去玩并去拿烟等东西。

我说：好远哟！天气又热，又没得好多油了。张书记说：周司机麻烦你一下，汽油到了保证有，今后他们回来也有你一份礼物。当时杨××还给了我和吴××一人两包劲松香烟（那时很缺烟）。由于和刘××他们关系比较好，我让不过人情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由319杨××、刘××、周××等人把枪下成零件，捆成柴火捆子，放在车上。10点多钟才出发，沿途过检查哨时，张书记他们就事先下车，挑着柴捆子步行过去，我们开车到前面等候。在车上去三汇坝的有杨××、刘××、赵××、邓××、罗××，建工校一个叫刘老板的，以及三汇坝的3个人。

在到北碚的中途，刘老板下车回家拿了一支半自动枪下成零件，用纸包着又

¹三汇坝：地处华蓥山下，当时属与重庆市北碚区接壤的四川省合川县（后改属重庆市）。

²掌火：方言词，指主持工作，拿主意，掌权。

继续开。到达北碚已是1点钟（由于过检查哨耽误了时间），我们就在北碚公共汽车总站杨××的熟人（驾驶员）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我问：还有多远到三汇坝，杨说：可能还要走重庆到北碚这么远。我听后就说：好热哟，并有点发牢骚。杨××就说：你若不愿去了，我就在总站找一个人开去，你在这里休息。我说：来都来了，算了，我自己开。1点多钟就又出发了。

预先都未估计到北碚渡口有检查哨。快开拢时忽然发现渡口有解放军端枪查车很严，当时都很慌。杨××说：快停车，叫他们下来过渡船。我看到解放军已注意我的车，怕停车下东西下人反引起注意就完了，就说：不能停。便硬着头皮开上排队过河。

这时几个解放军便端着枪站在车的两旁监视，有一个就在检查驾驶室和揭开引擎盖后，便爬上车厢检查去了。顿时都很紧张，我和杨××在车下故作镇静的谈话和看河边不看车上，刘××便跟着爬上车把检查的解放军缠住，一会儿问：重庆好久成立革命委员会等¹，问这问那，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解放军边看边回答：那要看你们两派联合得怎样……看到一个空车，车上除了几个人和一个纸包、两捆柴，并检查了包裹等，还搜了身，就下去了，我们也松了口气。

但一会儿解放军还不放心，又上车检查，并弯腰要去拿随便放在车厢上的纸包。刘××便说：那是一卷纸。但解放军还是准备去拿。刘××便急忙朝坐在车厢后的赵××使个眼色并转身问：你的肚子痛呀？赵××会意，并用手按着肚子唉哟哟的叫痛，好像发了急痧一样装得很像。刘××急忙问：解放军怎么办，他肚子痛，你们有没有药……果然那个解放军便抬头转身来看并说：下去买支冰糕吃嘛……随后就下车去了。这一难关就这样滑过去了。

过河后又开了很久，在半山腰上一煤矿处又有一检查哨，我们又停车休息和给汽车加水。张书记挑着柴捆、刘××扛着纸卷包步行过去。然后我们开车到检查哨检查后，又到前边去等候。约下午3点多钟，到达了三汇坝。

车子停在路边，在唯一的一家饭馆里吃了饭。张书记和饭馆的人很熟，都热情的招呼他张书记。并要啥来啥，红烧肉、瘦肉丝、粉蒸肉、素菜、酒、稀饭、肉面来了一大桌。但由于很累，天气又热，吃了点想睡，就领我们到另一间粮店的房里睡觉去了。叫醒时已4点多钟，我就准备走。一看汽油也快到零了，车子也坏了，发不燃。张书记结果找汽油也未找到，因那里人的车都走了。后找来一个司机帮我把车修好。

杨××说：你看开不开得到北碚？到总站那个人那里去要油没得问题。我便说：回去是下坡，问题不大。走时老张还给了我5包烟，我便独自一人开车往回赶路。一路上我怕在这深山里抛锚开得很快，为了节约油，下坡快速滑行。由于

¹ 此处可能记忆有误，因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已于1968年6月2日成立，前边说这是6月上旬的事，那时已经有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路窄，很多军车都停着让我超车。快到北碚渡口时，才把军车队超完。过河后已是5点半钟。

我就去找总站杨××的熟人，找到后，他说：很对不起，今天下午站上两派打了架，总站车子都关起来了，班车也停了，谁也不敢去开，拿不到油，并感到很抱歉，也急得没法。我说算了，我开到哪里在哪里打主意，告辞要走。

这时街上一老头农民，拿了些东西，苦苦要求我说：客车也停了，我从三汇坝来，要到重庆儿子那里去，请你把我搭到重庆去嘛。我看情况是真就同意了。他要上车厢，我便说：老大爷到驾驶室里来坐。于是告别那个人走了。

一路上开的很快，加油后进行高速滑行，节约用油。行至沙区杨公桥车站便没有油了。这时我便停车，把过去私藏在车上大油桶里的4加仑汽油加入了油箱，继续往回赶。大约7点钟，天还未黑时赶回学校。

那个农民老头在校外公路上下车，当时还送给了我一小包杂糖、烟等物拿回来和吴××、杨××等人大家吃了。

从河运校挖枪

一个晚上，刘××、杨××和那个三汇坝的人，叫我开车到河运校航锋去搞枪，说事先已和河运校的人联系好，他们的人去挖（埋在土里）。为了安全，河运校还坐了2个人在车上。同去的还有三汇坝的人。

车由重医大门进去，到后校门停车房处等候。由河运校的人回校去挖枪，我和刘××、三汇坝的人在重医后校门传达室等候，与守门的人吹了一阵牛皮。我们装成反到底钢校的，当守门的人问我过机校危险，我说：冲过去就是了。那人还谈了机校如何坏，常在那里拦车，并叫我们回去时注意点。

过了一会儿，从后门进来了一些人，拿着挖出的枪，一看不是我们的人。又等了一会儿，我们的人来了，挖到两支半自动步枪，枪身有的地方都生了锈。

上车后我就开车回校。行至袁家岗遇到毛××等八一兵团的人拦车，并朝天打了一枪，我赶快停车，并骂了一声：学校的人都认不到呀，怎么搞的？便开车回校，在学生食堂围墙边停车。从长楼木工房边及行政大楼旁边小路，把枪背回四幢楼底楼319班赵××寝室。刘××他们还帮三汇坝的人搞了6铁盒14.5子弹，用6个买的黑皮包装着。由于我不去三汇坝了，就由杨××、孔××与沙区供电公司汽车队长谢××（谢师傅）联系好，由我第二天开车把东西从学校运到谢师傅家里（同车去的有邓××、杨××、孔××、刘××及三汇坝的人），我就回校了。听杨××等人说，第二天他们乘供电公司车队的工程车（不易受检查），与河校的人一起上三汇坝去了，武器弹药也随车运去。

二上三汇坝

6月中旬，除张书记外，上次曾来过的另两个三汇坝的人又来了，也是找杨××刘××等人搞武器。我便对刘××、邓××等表示，这次我不再愿去三汇坝了。刘××、邓××也发牢骚说，东西给少了，划不来。这次应付过去，下次再也不管了（我倒不是因东西给少了，而是天热，路又远、又危险）。

有一天上午，邓××、杨××叫我开车再帮跑一趟，和三汇坝的人一起到北碚总站杨××熟人（公交驾驶员）那里去拿烟等东西。说事先由三汇坝有人坐班车拿下来在北碚等候。经刘××、杨××、邓××劝说，我才开车同刘××、邓××和三汇坝的人一起到北碚去。去后未见三汇坝的人下来，就叫我开车到北碚邮电局，那个三汇坝的人就去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他们就决定只有开车到三汇坝。我看既然来都来了，又经邓××劝说，就开车到了三汇坝。到达后听说已坐班车走了，我就立即倒车往回开。到北碚后找到了那人，有几条光荣烟等物（包着的），回校后给了我两包烟。回来后我表示再也不去了。

1968年7月8号晚攻打重医

打重医¹那天晚上先由杨金华带着学校武斗人员到学生食堂集合分配任务，叫106、105、301、209等几个班打主攻，202班赵××带领几个班守学校后面袁家岗山堡（好像是222、221班的），并说由附一院红工的人带路。记得当时红工负责人周××还介绍了情况。当时杨金华说，主要打偷袭。还有20中、35中等单位，五一校、石油校从大坪配合。并叫我和陈××负责开车等候运送伤员。

杨金华带着武斗队出发了很久后，大约8点多出发，我和陈××才开车从石坪桥、杨家坪，到袁家岗堡堡下面下坡处慢车道旁停车等候。记得那时307班孙××、廖××及319邓××等人押车。邓××跟的我的车。到袁家岗等了一阵，见重医没动静，也无伤员送来。偶尔听见乱枪声，邓××未搞过武斗，怕被飞弹打着，吓得趴在路边。

一会儿我见对面有一个建工校的在用枪打路灯，就说：不要乱打枪造成混乱。他说：要把灯打熄，他们的车要运海二联²到35中去打红总（注：242红总³）。

¹ 1968年7月7日至9日，八一五派向大坪地区原由反到底派控制的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煤矿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发起总攻，反到底派败退撤离。242部队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时中弹身亡。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这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

² 指口径为20毫米或25毫米的两管高射炮，主要装备在舰艇上，俗称海二联。重庆武斗中被从军工厂拿出来大量使用。

³ 即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是重庆军事院校中反到底派的主力。

我看他打了几枪未中，就过去说：我来打。他说还打一枪，又未中。就让我打。于是我就用半自动打了3枪，把附近的两盏路灯打熄了。

一会儿建工校的就开车把海二联从慢车道运到35中去了，并向红总大楼射击。邓××怕被飞弹打着，中途走了。又等了一会儿，我见还没有来伤员，并见陈××的车开走了，也就开车回学校休息，车停在学生食堂后面，到厨房里去要了一会儿。记得有杨××、唐××、牟××、刘××几个女同学在里面做饭。并看见有两个解放军来找负责人劝说：不要打重医，要犯错误的。我们说，负责人不在都到重医去了。解放军没找到负责人就走了。

一会儿建设厂八一兵团开车拖了一门四联¹，从食堂厨房后面拖到长楼木工房边向242红总的大楼射击。射手我认得是八一兵团陈××（因他67年在七医大曾对我讲在打嘉陵厂²时他如何用四联扫射，打得很准），同时还有好几个背102全自动步枪的人保护（认不得）。

看了一会儿我就又开车回袁家岗原处，大约已是11点多钟。当时是赵××带领部分人守袁家岗山包，后他们也到附一院去了，并看见建设厂八一兵团毛××带了部分人到重医去了。我不知道情况如何，等着也没意思，就把车开到附一院断墙边一小食店旁停着（看见陈××的车也停在那里）。我就从断墙处进去（当时很多人都从那里进出），在外科大楼底楼走道上看见很多人，各单位的人都有，秩序很乱。

我听说我校的在内科大楼，就穿过外科大楼到了后面左边内科大楼，看见守在门口的蔡××、胡××、杨××、张××等人，并告诉我：机枪已上房顶，房内情况不明，正由杨金华带人搜索，叫他们守在门口严防外单位人员进入。

我说上去看一下，走到3楼碰到杨金华，我说：好多人在外科大楼抢东西，还有我校的。杨金华生气的说这些人不打仗光知发“国难财”。并叫吴××、夏高万去制止，不准抢东西。我便领着吴××、夏高万到了外科底楼。当时吴××大骂：不准抢东西，把东西放了，不放就枪毙谁。进行制止。

我这时看人这样乱，万一混进了反到底就糟了，就离开了外科大楼从断墙处出来，把车开回袁家岗原处，坐在驾驶室里。又过了一阵，估计已是半夜12点或1点钟了，我听过路的几个人在说，35中门口有个反到底的，是在重医附一院抓到的，嘴还很狡，自称是铁杆反到底。我就关好车门，把半自动步枪也放在驾驶室里。

到了35中大门口进门的右手的一校门砖柱边，看见十几个背枪的人围着，

¹ 指四管联发高射机枪。

² 嘉陵厂：国营嘉陵机器厂，重庆的大型兵工企业，代号451厂（重庆2301信箱），位于沙坪坝区双碑。在主要由八一五派占据的沙坪坝区和北碚区之间，反到底派占优势并占据了生产区的嘉陵机器厂成为一大障碍。为排除障碍，并控制嘉陵厂生产的子弹，八一五派于1967年8月11日开始动用枪炮、坦克向该厂发起进攻，据有关史料记载，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357万元。八一五派于13日全部占领该厂。

议论说是个重纺东方红的砸派，在附一院被抓到的，还有枪。我便挤进去看，在微弱的远处路灯灯光照射下，我看见一中年人仰面躺在地上，头部朝谢家湾方向，并在低声呻吟，记得看的人有几个中年人（可是八一兵团的）及几个学生（认不得，天黑灯光暗，当时也未注意看人），也未看到我们学校的人。当时旁边看的人还骂他装死，并威吓要枪毙他。有的还向那人扔石头，那人当时还低声反复说：“你们补我一枪嘛”（那时来往路过看的人不少，记得那时 35 中门口还有两个女同学抬着西红柿准备送到重医），这时不知是谁看到了我喊到：周文川，到处找你，你们班杨××受伤了，抬回学校医务室去了，快开车去。

在后校门下车又碰见毛××等几个人从谢家湾上来。这时从袁家岗上面有一辆车开着大灯高速冲下来，毛××高喊哪里来的车？停车、开枪了！我见车未停，也跟着喊停车，并用手枪朝天打了一枪。车未停冲过去了。

我走到学校医务室，郑××见了我生气的说：你跑到那里去了嘛？到处找你。我说：我就在袁家岗，听到杨××受了伤，就来了。于是便由郑××等几个人赶忙用担架把杨××抬出后门上车，由我开车送往七医大。同车去的有郑××、张××及几个持枪护车的人（记不得是哪些人了）。行至工学院处，消防中队旁边工分部楼上有人鸣了两枪，我便急忙停车并骂道：瞎眼了？运伤员的车！一路上开得很快，没开车灯。

行至陈家坪石油转运站转弯处，遇到石油 815 老张（张司令）等人拦车，见是我们就让开走了。这时我怕走凤鸣山危险，就决定开车经沙坪坝小龙坎到七医大。怕检查哨¹找麻烦，就都把枪放在杨××担架下面，这样经小龙坎时，解放军见是运伤员的车又没发现枪，就通过了检查哨。

车开到七医大外科大楼（住院部）时，估计已是深夜 2 点多钟左右，到处鸦雀无声，无一人影。杨××的情况也较危险，脸色变得苍白，身体冰凉。郑××叫我不要走，一起去找医生，说我人熟，找红总的人想办法（因 67 年武斗中住在七医大认识几个人，但都不知名）。于是我就到红总原团部大楼找人，但四处黑洞洞的无一人，喊也无人答应。找了一阵我就回到外科大楼门口，当时我们都很着急。这时 35 中也开了一辆车把附一院负责人周××送来了（周××脚受了伤），听说是和杨××在遭遇战中一起受的伤。

一会儿我看见有一个红总的人在说，现在半夜里都睡了，哪里有人，医生也都回家了，并问我们是那里的？我好像有点面熟，见过这个人，就赶忙上去给他讲明情况，说我们是机校的，要他帮忙想法，找一下医生救人。我和郑××说了一阵他也就答应了，并说不一定找得到。还说：前几天有辆车送了个伤员，也是晚上，见没人就乱打枪，结果把值班医生吓跑了，人也没人抢救，死了。叫我们

¹ 指重庆驻军收缴武器的检查哨。当时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已经（6 月 2 日）成立，加大了收缴武器的力度。

千万不要打枪。于是我们心里有底了。

他一直带着我和郑××等几个人走出七医大到公路对面附属医院（西南医院¹）里面进去很远的住院部里去找医生。到了那里的值班室他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枪露出来了，更不要打枪。于是就由他去叫门。叫到第三间屋才有人答应。开门后先由红总那个人把情况讲了，并把杨××的伤说得严重需急救。我和郑××也把情况说了一下要求医生快点。这两个医生才慢慢的穿好衣服，拿上手电筒出发。到了外科大楼后把杨××抬到了急诊室（手术室），我便开车回学校了，随车回来了几个人（记不起了）。郑××、张××等人留下看护杨××。

回到学校后大约4点多钟左右，我很疲倦，就到寝室里躺了一下。听到长楼四联打得很响，就又去看打四联。还是陈××在打，打时还问旁边的人打准没有，偏左还是偏右，高了还是低了？当时八一兵团的人都说打低了，我也说还应偏右点。当时我还看见四联的枪管都打红了，直冒青烟。由于打低了，打了一会儿重医附一院一幢遮住了242红总大楼大部分的家属宿舍房顶被打燃了（燃了一阵后又熄了）。同时还看见附一院靠两杨公路后门一带有高压线被打断掉在地上而发出强烈的蓝色闪光很亮（估计是35中建工校那门海二联打断的）。同时还看见大坪公安校242文筹也用1单管高射机枪向红总大楼射击。打了一阵天蒙蒙亮了。有个八一兵团的叫走得了，天要亮了。

陈××说：慢点，等天还亮点，老子看准了再踩几发。又等了一会儿，天色又亮一点了，陈××就又坐上四联，校对好目标，脚踩四联击发器打了几梭子。便赶忙收拾，把四联拖走了。走时陈××还说：这回可能打了几百发。我便回寝室去了，这时天已大亮。

在寝室里碰见张××，我便开车和张××带了一些吃的物品（记不起是什么，是张××给杨××拿的）到七医大去看杨××。

到七医大后，郑××说杨××动了手术急需输血，快回去喊人来输血，多喊些人来。并说：昨晚上不是张××输血，杨××就完了。张××开始还不输，说身体不好又瘦，我牯倒²他才输了，因为只有他是O型血。

我便开车急忙和张××返回，并直接开到附一院到外科大楼找吴××一起去看杨××，并叫人去输血。喊了吴××及周××等人，我又开车回学校喊人。开到进校的路口发现已有一辆车运了些女同学去了（记不得是谁开的车），那车上的人还喊：还要运人去（主要去检查血型，人多去保险些）。记得那车上有何××、肖××。

我开车回学校，和吴××、张××又喊了319的刘××及周××、唐××、王××，还有209的几个男同学和其他一些人（因说男同学的血要好些）。

¹ 西南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沙坪坝区高滩岩。

² 牯倒：方言词，强迫、硬逼之意。

到七医大后，刘××、周××等人检查合格输了血。我和吴××、张××及刘××等人到病房去看了杨××，当时正在输血昏迷不醒，看样子危险，医生还填写了“病危通知书”。看后留下了郑××和蔡××。我就开车和吴××、张××等人及一些女同学回校了。

回校后大约9点钟，我便从袁家岗小路去重医附一院看情况怎样。到内科大楼后杨××就带着人叫撤回学校，我也跟着回校。路过35中我再去看那个重纺东方红的俘虏时人已经不见了。只见地上有些乱石头，那人原头部方向位置有一小凹处，里面有一些脑浆。不知当晚被谁打死弄到哪里去了？

打重医后平时摆谈中，我曾把我那天晚上在35中门口见到的情况和听说的，对吴××、罗××、张××等人讲过。那时吴××和罗××还津津乐道的说是他们捉到的，还谈了过程，杨金华还表扬他们警惕性高等。罗××还把他亲手从那人身上缴获的军用子弹盒给我看过，里面还有50发子弹。并说俘虏还被他们押着带过路，发生遭遇战后，听说被周×押下去的。

记得（19）69年1月份有一天我班在大操场跳忠字舞，有两个工宣队来找吴××。后我到厕所解小手出来过去看，才知是重医工宣队了解打重医关于俘虏一事，我也把自己当晚看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还记了我的名字。

二、几次抢枪的情况

抢沙区武装部

（19）67年7月中下旬，打三钢延安兵团和抢武装部后，由于我校抢了部分半自动步枪，没有子弹。有一天，伍振友叫我开车前往沙坪坝师专提运一箱子子弹（半自动的）。到师专领到子弹后，听说沙坪坝各单位都集中到区武装部抢武器去了，此时车上的伍振友、吴××等人以及钢校、电技校的都主张，并叫我快开车去。我于是把车开到一中后门下坡处停着，就和伍振友、吴××等人一道步行前往武装部。

到武装部后看到抢枪的人很多，解放军阻拦也无用，我们也就跟着去抢。伍振友抢到一支缺复进簧的半自动步枪（后由驻校八一兵团毛××他们配好了）。当时抢枪我们未在一起。吴××抢到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我也冲进另一间挤满了人的屋里抢枪，把墨镜和汽车的电门司维子都挤掉了。但里面都是老式步枪，没有要就出来了。里面也很热。

出来后我看见有一个人抢到一支缺机夹盖、复进簧、机芯零件的半自动步枪，看到缺很多零件，他不怎么想要，就放在门外边，又进去抢去了。我听说八一兵

团可以配零件，就偷偷把这支枪拿走了。

钢校、电技校的抢到了两挺缺机芯、弹盒的五六式轻机枪和一挺捷克式机枪。此时伍振友他们都出来了，怕解放军来了就叫快走，我们便赶回汽车处，用汽油把枪上的机油洗掉。等人到齐了，我立即想法把车门打开（因掉了汽车电路司维子，它也管开车门），开车从凤鸣山回校。当时伍振友坐在驾驶室里，吴××站在我们车边吊着，要进校门时，吴××还用手枪向重医方向打了几枪，并打断了路边电话线。回校后，我这支枪拿给毛××配零件，但一直没有要回来。

抢通用厂驻军的枪未遂

（19）68年2、3月份那段时间，武斗又渐渐开始，两派已经开始抢枪。那时我和我班吴××、胡××、杨××、郑××、胡××、冉××、蔡××、乐××、余××、李×、张××、吴××等人在江北石门织造厂。当时石门地区各单位，有搪瓷厂负责人老文（文麻子）、老张（张花脸）、织造厂吴××，永安厂胡天棒、老袁，造纸厂三车间朱××及电线厂负责人。轻技校唐××和我、吴××商量一同去抢通用厂驻军7804部队55分队的枪。由于人手不够，吴××等人叫我们再到学校叫一些人来。

我便和吴××打电话通知学校开了两车人来，记得当时是307班的项××接的电话。由夏高万带领李××、刘××开的车，乘轮渡过的河，由吴××、唐××、吴××等人到河边，直接从河边小路带到通用厂去了。我就打电话通知永安厂的人王××、王××、王××等人从小路赶到通用厂。还未到解放军驻地，中途就看见夏高万他们成群结队空手回来了。一问才知解放军有准备，防守很严，新兵还打人。未抢到，他们就直接回校了。

抢搪瓷厂驻军的枪未遂

在这之前我们班在织造厂的人还和该厂轻技校唐××、刘××、吴××、许××等人一起去抢了驻搪瓷厂55分队一个班的解放军的枪（主要怕搪瓷厂工中的学生先动手），解放军住在搪瓷厂办公大楼三楼。晚上去时解放军战士王××、曹×、老杨几个人正在打牌，见我们的人来了还以为来玩。看见我们的人拿枪便赶忙阻拦制止，做思想工作。乐××拿到一支冲锋枪当时都还了。我和吴××不好出面走在后面。

当时有一个战士就生气说：你们这是反革命行动。王××就批评我和吴××说：我知道是你们出的点子，所以走在后面，并跟我们大家做工作。由于我们关

系较好，看到放枪的屋门也关了，也没有再抢的勇气，也就走了。

后来听解放军说：当晚连部就叫我们把枪拿去集中了。并取笑说：当时你们自己不拿后悔晚了。

中梁山煤矿北井抢枪抢车

（19）68年6月上旬，中梁山电机厂“四野”的学生十多人，开了一辆解放牌翻斗车到我校接人，去中梁山煤矿北井解放军驻地抢枪。当时何××、杨××、曾××（105的）等人约我班吴××、杨××、胡××、蔡××等人一起去，还有王××、吴××、陈××等人，我也和他们一起上车去了，并带了一挺重机枪防止煤校拦车，吴××为射手。

行至煤校过去一段路，有一辆8711部队的军车未让路，吴××就用机枪鸣枪警告，军车就急忙让路。超车后，车上人就喊停车拦车，并说8711是反到底观点。停车后便一哄而下，强行抢劫被我们车逼到路边停下的军车。由124班王××和吴××等人抢解放军的汽车电门司维子。解放军坚决不给，未抢到。就把两个解放军强行拉下车（当时解放军大骂：你们简直是土匪），就由王××接通汽车线路开走（我当时看王××开车不熟练，叫让我开，王不干，我便和吴××坐在驾驶室里）。

先开到电机厂停了一会儿，又上了一批“四野”的人。出发时吴××就对王××说：让周文川开，他技术好些。因王××操作还不很会，怕跑不脱。于是就由“四野”那辆车带路，我开抢来的军车走后面，直奔北井解放军驻地。

到达后车上的人便一哄而下冲进驻军楼房，在抢枪的过程中和解放军产生扭打现象。我和204班何××后上去，未抢到枪，还被解放军拉住了。看见两个战士上楼来时头已被打伤流血。经教育后，便把我们两个放了。其他人早已夺路逃走。车被解放军扣了，后我和何××在标准件厂碰见他们，吴××等人还说：我们以为你抢到枪往那边跑了呢。这时才知吴××、杨××、何××各抢到一支五一式手枪，听说电机厂“四野”的也抢到一支半自动和一支手枪。等了一会由标准件厂派车送回学校。回校后听吴××说：当时解放军来追，我开了两枪，解放军是些新兵，被吓倒了就不敢追了。

抢嘉陵厂弹药库

（19）68年6月中旬我校听说五一技校等单位在双碑嘉陵厂弹药库抢了很多四联高射机枪、14.5子弹，便由夏高万带领30多人乘刘××和李××开的两

辆汽车直奔嘉陵厂弹药库抢弹药。我坐的李××的车。到达后解放军阻拦被人拉开。我和吴××、胡××、何××、吴××、杨××等人担任掩护，带了一挺机枪和各带一支步枪。后都参加了抢弹药。装第一车时我也进去扛几箱、大约五箱。吴×力大一次竟抢两箱。李××和刘××先运了一车到沙区供电公司。李××第二次回来运时就干脆直接把车开到弹药库去，人到房屋里直接把弹药往车上传。我也参加了。我们装满准备走时，二机校的车也来了，装了很多 12.7¹弹药。由于怕情况变化，我们就急忙上车，由李××开车返回，沿途又碰到建设八一兵团、建工校等单位也去了。我们先到供电集中后，先由供电派一汽车把我和吴××、何××、吴××等人送到石桥铺路口，担任守路口，然后再由供电公司汽车队长谢××派一辆车协助和我校的两辆车一起把弹药运回学校。因学校大校门被重医封锁，便在后校门下的车，全校学生出动搬回学校。当晚学校停电。共运了三车约有二百多箱。

抢建设厂枪支零件

（19）68年6月中旬，建设厂八一兵团和反到底建设兵团发生武斗后，八一兵团占领了建设厂后的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及我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到建设厂抢枪（从谢家湾贸易商店旁边建设厂围墙一缺口处进去）。

早上8点多钟，我才和吴××、蔡××、胡××、杨××、唐××、郑××、罗××、周×等人从谢家湾断墙处进去抢枪。到厂房里后看见抢枪的人很多，到处都是，解放军也管不住。

我和吴××、郑××、唐××在一起抢了10多根枪管、一些枪托及部分机芯枪栓等零件。抬回学校后，零件不全，还差机夹盖、复进簧、活塞杆等零件。我就和唐××又到建设厂去找。在厂里听有人说一车间是总装车间，机夹盖等零件都有。我便赶忙和唐××穿过办公大楼到一车间去找机夹盖等零件。

到一车间后果然零件都有，但已被抢得差不多了。我和唐××找了一阵才找到了最需要的机夹盖30多个，还有复进簧、活塞杆等零件及百多个弹夹，用一小木箱抬回学校寝室，进行装配。加上胡××、周×、蔡××等人抢的枪管零件，一共装配了大约20多支步枪。

在装枪过程中，石油8·15一个叫唐师傅的人，由吴×带着来要枪给他徒弟。我和杨××商量后，觉得石油8·15的常给我们修车，就给了一支。不久遇见沙区供电8·30的老秦来要枪，我也和杨××商量后给了一支。319孔××带着沙区二总站（公交）的外号叫“凉粉”的来要枪，由吴××给了一支。我还给了重

¹ 指口径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

大王××一支。那时兵团团部杨金华叫每个班上交2支枪，拿到长江厂去换子弹。吴××又上交了3支。杨金华带242文筹的来要枪，吴××又给了一支。记得胡××还送给他们同学一支。7月8号晚打重医杨××受伤后，吴××又通过112班一个同学关系，和南桐来的人用两支枪100发子弹，换了6只鸡、一些鸡蛋。鸡和部分蛋拿去杨××吃了（6只鸡是我收的并付了2支枪和100发子弹，是因吴××不在，又未找到。在112那个同学带来和喻××等人看到给的）。

记得在建设厂抢枪不久，吴××还通过我班李×关系，和南岸那边一个学校用5支枪换了400多发子弹。7月中旬，由吴××做主又给了2支枪给织造厂吴××，吴××还给了2只鸡，我们给伤员吃了。并在之前送了6床毯子给我们（现都还了）。同时还送给石门永安厂王××、鸡娃等人3支枪，王××、王××还给了我们一桶汽油（枪由我开车送到中渡口）。吴××说造纸厂3车间的人还比较好，又送了一支给3车间朱××。

我和吴××、胡××、蔡××、周×等人一人还有一支枪，在（19）68年8月份兵团团部收枪，我和吴××、胡××、蔡××等人就把自己的枪及剩的子弹一起，交到团部王光林那里去了，后被工学院解放军强行拿走了。

三、武斗用枪的来源及到哪里去了的交代

第一次用小口径换了一支加拿大手枪

（19）67年7月份，我校杨金华带领武斗人员攻打三钢延安兵团后，抢了江北区武装部枪支，我是开车运人未参加。

回校后由于我没有去，我们就到教室大楼夏高万住的保管室拿了一支小口径步枪（里面有好几支，有的缺零件），并找广播室项××要了几盒小口径子弹，在学校打麻雀耍。

有一天在食堂吃饭，钢校的外号叫“坐肩”的看到了我，说我开车应有支手枪护身。并说他们有人有支手枪无子弹，叫我拿小口径去换，我就同意了。并由“坐肩”带到3幢楼他们寝室里，和那人换了手枪（那人记不得了），这事后对吴××等人也讲过。并找别人要了2颗子弹。有一天我和建设厂毛××及电技校的几个人到学校铸工车间后面打了一颗，毛××也打了一颗（他也有支手枪，建工校小刘给的），电技校的也打了几枪。

（19）67年7月底和杨××、吴××到火车站接杨金华等人未接到，第二天返校在袁家岗遭到重医射击，杨××把我那颗子弹乱打了，吴××知道。回校后我到处找人要我这种枪的子弹，301有个同学说他有几发给了我（我那种手枪

都说叫加拿大小手枪，105 班外号叫“肺病”的也有一支)，东找西找共找了 20 发左右。(19) 67 年 11 月份那段时间我和 221 班郭××到学校防空洞，校枪准不准又打了几发，郭××也有支手枪也打了。

(19) 67 年 12 月底，我和吴××同我班的 20 多个男同学被杨金华派到江北石门织造厂，到那里后，有一次我和轻技校唐××、许××到造纸厂 3 车间老张、朱×那里去玩，许××叫我给唐××打一枪。我就给唐××朝窗外打了一枪。

2 月份石门民中“尖刀”的在盘溪街上抓人，并打伤搪瓷厂 8·15 负责人一小孩，我便和吴××、唐××、吴××及我班和轻技校其他几个同学去救。在盘溪街上和“尖刀”遭遇，他们赶忙向高地撤退，并拿出了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吴××冲在前面先发制人，首先向“尖刀”的连开几枪。对着“尖刀”一吹冲锋号的及另几个人的下身开枪，听说打到一个人的屁股。吴××和唐××等人据说看到的，后来也听说“尖刀”有一人屁股被打伤了。

在吴××开枪后，我也用手枪朝天打了几枪，唐××等人在我后面看到的。后他们还笑话我只朝天打枪，并说吴××打枪姿势好看，吴××也自吹。记得以后我就只有 5 发子弹，后被轻技校刘××拿去玩，在伙食团走火一枪还剩 4 颗子弹。

有一天我回家，刘××便把枪借去，唐××借了吴××的枪，后由刘××第二天拿到造纸厂 3 车间去被别人偷了。造纸厂朱××、老张等人及吴××等我班在造纸厂的人和唐××、永安厂的王××、××等人人都知道。

第二次借了一支半自动步枪

(19) 68 年 3 月中旬，我回校找王光林借了一支无刺刀的半自动枪。吴××找彭××也借了一支，拿到织造厂。我和吴××用它打过灯泡。有一天搪瓷厂食堂老工人在盘溪街上被“尖刀”的抓走，闻信后我和吴××、张××、唐××等人持枪坐永安厂的车和王××、王××等人到盘溪去救。我们赶到后，“尖刀”的人已抓人跑了很远。我和王××、张××、吴××就占领高地射击，“尖刀”的为逃命才放了抓的人。

我用的借王××那支无刺刀半自动，看到“尖刀”有 2 人从 400 多公尺外的一水田跑时，便和吴××一起射击。当时我开枪后发现一人倒在水田里，后又爬起来跑了，估计受了伤。后听王××说，“尖刀”有一个腿受了伤，不知是不是我打倒的？

3 月底我和吴××、胡××等本班十多人回校（杨金华调回的）时，织造厂要求留支枪，经王光林和杨金华同意，我和吴××就把我借王光林那支枪送给他

们了。

第三次用零件装配了一支半自动步枪

3月底我们回校后，找八一兵团的人搞枪。那时很多人到一宿舍找八一兵团的人，从厂里偷枪零件出来配枪。我看见123班刘××等人找八一兵团一个叫刘师傅的人搞枪，并叫刘××给我说情，刘师傅就到厂里给我偷了些枪的零件配了支枪。后吴××、唐××也找这人搞零件配了支枪（当时我们在一宿舍等刘师傅进厂把零件藏在身上拿出来，在宿舍厕所里给我们，其他各地来的很多人都是找八一兵团师傅这样拿的）。杨××、胡××等人是找他们在建工校的同学搞的。我班胡××、冉××、乐××等人也找其他的人搞了支枪。我还搞了支未发蓝的枪管装了支枪给了张××使用（因张××在学校照¹家，叫帮他搞一支）。

3月底4月初，织造厂吴××等人和造纸厂朱××等人到我校来找团部杨金华、彭期远等人，一再要求我班的人再到他们那边去支援护厂。吴××也主张去。于是我和吴××、杨××、胡××、郑××、胡××、乐××、蔡××、张××、冉××、张××、李×、吴××等十几个人，每人都有一支半自动。4月初又坐李××及罗××的车到中渡口过河再次到织造厂。

张××、吴××没枪，用的兵团杨金华由（19）67年藏下来的两支枪。郑××用的吴××给他搞的一支枪。到织造厂后小型武斗常发生（以江陵厂军工和八一兵团为主），我们有时也在地区指挥部永安厂老袁带领下或吴××带领下，和轻技校唐××、吴××、刘××等人到盘溪上面山堡向江陵新厂内反到底军工大乱打枪示威，或向盘溪41车间后面八村军工占领的红砖房子射击。

4月中旬，听说反到底准备袭击石门地区，武斗也逐步严重，并发现军工在八村高地挖工事。驻搪瓷厂解放军3月底就撤了。搪瓷厂、永安厂负责人老文、老张及老胡、王××，还有织造厂吴××等就叫占领搪瓷厂高地，如被反到底占领，石门下面几个厂全完了。

于是有一天晚上，搪瓷厂老文、老张及王××、老胡等人，还有电线厂的，就叫我们和轻技校、搪瓷厂工人中的人及各厂一些武卫人员（工人），到搪瓷厂高地挖工事。搪瓷厂拿出了一些麻袋修筑沙包工事。并经常晚上去守。那时搪瓷厂老文还给了我一个军用子弹袋，工中王×还给了我一根军用步枪背带。李×和胡××也搞到了子弹袋和背带。

有一天江陵厂军工和八一兵团钢八一打起来了，打电话到搪瓷厂，叫守住搪瓷厂高地。老文老张就通知石门各厂武斗人员上去守。我和胡××、胡××等人

¹ 照：方言词，照看，看守。

及轻技校唐××等人，还有工中王×等，到江陵厂八一兵团去，又回到搪瓷厂高地。

由于对方阵地有目标，王×、大毛等人就叫我打一枪，并说给我子弹。我就在搪瓷厂高地水池背面墙角，向对面反到底阵地一跑动目标打了一枪（约 350—400 公尺）。当时发现被打目标跌倒了，都吹捧说我打倒了。我也提劲¹说“你我枪法如何”等。但不知到底怎样？以致出现以后传说打死一人的事（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做详细交待，并绘了详细图纸）。

第四次要了一支土制小口径手枪

4 月底杨金华把我们调回学校。走时，永安厂找我和吴××要枪，我和吴××商量后，就把我给张××搞那支未发蓝的枪给予永安厂王××他们了。并找老胡要了支土制小口径手枪（江北铸管厂造的，那时吴××、胡××等人都搞了一支，记得胡××还是用半自动换的）。

回校后，5 月份全市交枪，杨金华叫我班不交，被杨金华、郭××到寝室来把我和吴××、胡××、李×等人的枪和子弹袋一起拿走了，未交，后也一直未还我们。

我那支土制小口径手枪拿回学校后，枪膛生了锈，上不了子弹，坏了，一直放着。有时修理拆成零件，放在床上，掉了上弹夹的一块铁片。后来荣昌上面来了些人，住在医务室到我校搞枪，通过彭××、王××，我才认识其中一个负责人，都叫他老李。有一次他还给了我和彭××、王××一人一听白糖，后来我就把那支坏了的土制小口径给老李了。

第五次装配了一支半自动步枪

68 年 6 月份，我和吴××等人在建设厂抢了 20 多支枪（在 70 年 1 月 16 日关于参加抢枪支、弹药问题的补充交待中已详谈），除送或换了东西外，每人留了一支。我那支在打重医那天晚上打路灯时打了 3 枪。（19）68 年 8 月份团部叫交枪，我班带头，我和吴××、胡××等人就把枪一起交给团部王光林了。后被工学院解放军强行从王光林寝室收走。

第六次是与人合用一支

¹ 提劲：又作“提虚劲”，方言词，自吹，有“打肿脸充胖子”之意。

(19)68年5月份杨××在中梁山煤矿北井解放军驻地抢到一支51式手枪，杨××有时放在身上，有时我放在身上（主要是开车时放在身上防身）。后不知谁把击针搞断了，放了很久，有时也带在身上，7月初我和吴××、杨××等人到巴山厂¹去找八一兵团王××配了个击针。杨××打重医受伤后枪由我保管。

记得我把击针装好后试枪，朝天打了一枪，吴××看到的。(19)68年10月份，学校的人都说，手枪再不交，交不脱了，像上海那样。我就和杨××一起到学校防空洞把子弹打完了，拿到团部交给王光林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枪了。

第二部分 关于枪击死人事件的回忆交代

(1969年2月27日和3月2日的材料)

在(19)68年4月份我们第二次到织造厂后，我在搪瓷厂高地向203高地靠江陵厂41车间这面的八村高压线铁塔方向进行射击的详细交待：

那天不知是军工江陵兵团抢驻厂部队的枪还是抢三七炮弹，和八一兵团65团的打起来了。由于形势比较紧张，我们与搪瓷厂、永安厂、电线厂的武装人员就占领了搪瓷厂高地，主要是控制从203高地通过来的一条小马路，不让对方冲过来，以减少对山下各厂的威胁以及石门对面八一兵团的威胁。后来学生中不知谁提议到对门八一兵团去看一看，主要是想借口搞点子弹，搞点烟吃。

去后八一兵团叫我们先吃了午饭休息，作好准备。我们吃的是绿豆稀饭和馒头，我怕真的要上去，便找王×借了30发子弹，是大毛同意了才借的（地点在电影院）。后来我们就到八一兵团团部去要子弹和烟，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高个子负责人，说的是普通话，是管后勤的，他发给了我们烟，但说子弹少，又打了一些，就没给。后因两边僵持下来了，我们就回去了。那时守阵地的是一些工人。当时我校的和轻技校的都下去休息了。我和唐××，还有搪瓷厂工中大毛等几个下去，到了阵地我就把子弹还给了王×。我们那时的位置在靠下山这面的水池墙后面，侧边还有一幢小房子，我们在这里发现靠41车间上面的八村当头²高压线铁塔下的石头后面时而冒出一个人来又不见了，大家都认为是武斗人员，并在逗我们。都说：好猖狂。当时大毛、王×，就叫我打，说：眼镜打一枪、打一枪（当时在场的有轻技校唐××、永安厂的王××，还有工中的一个和王×住在一个寝室的工中学生，胖胖的，记不起名字了。还有谁记不起了），我说子弹少，我们规定的不准乱打枪，打了下去他们要说。王×说：大毛，打了给眼镜一颗。于是我就跪在水池墙角边准备寻找目标射击，忽然在高压线铁塔后面冒出一个人来，

¹ 巴山厂：即巴山仪表厂，原为重庆无线电厂二分厂。位于沙坪坝区石桥铺。

² 当头：方言词，“当”读去声，即尽头。

举着双手向我们这边摆了几下，便向他本人左边山堡方向跑，我就急忙对准这个跑的人打了一枪。枪响后我见这人像跌跤一样扑下去不见了，就说，好像打倒了，你我枪法如何？在我左右几步观看的王×、大毛等人都说，打倒了，眼镜的枪法不错。接着唐××也趴在我左面一个四方形的小土围子边向铁塔下石头边出现的人头打了三枪。

我射击的方向看得见一幢红砖房子的拱形房顶和墙的一部分，其他被山堡挡住了。被射击的人被与山堡连接的一个小斜坡坎挡住了下半身。当天是晴天有太阳。打枪那时是下午2点钟左右。距离有300多公尺，我打时未发现对方开枪。后来我们再没看见从对面冒出人来就更加认为是打倒了，但不知是死了还是受了伤。过了几天搪瓷厂8·15负责人老文和老张对我说：听说江陵兵团广播，抗议机校打死他们的一个人，说是个小孩，可能是你那天打的那个人。我说：在阵地上打的，他们又不知是谁。可能是他们栽诬的。何况又不是我一个人才开了枪（这是我到搪瓷厂去时老文、老张给我讲的）。这件事我给吴××讲过。后来其他人也知道了。

在工宣队还没进校之前，吴××与郑××在班上争吵，说郑××拉人挑拨同学关系，并谈到了说我在江北打死人一事是不经调查听风就是雨乱整材料。郑××说是大概是一个买米的小孩。我认为与我无关，八村我打的那儿一无粮店，又是阵地上打的，所以就一直不向组织交代，认为混过去就算了，免得找麻烦。所以过后对交代此事时态度也是不老实的。

如果经调查3—4月在八村高压线铁架下有人被搪瓷厂水池方向的射击打死，我承认是我打死的（那天的确切日期不知道了）。

敬爱的驻校工宣队、解放军、校革委：我在这次运动的一段时间里，错误思想是发展得比较严重和反动的，过去对江北搪瓷厂向203高地八村阵地射击一事向工宣队的交代也是不老实的。犯了很大的罪。我愿意接受党和工宣队给我的任何处分，并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我有决心改过自新，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希望工宣队、解放军、校革委让我回到班上去加入战斗的行列。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接受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不断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觉悟，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方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永远占领自己的思想阵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当年交代材料中附自绘图2张，①阵地位置图；②射击位置图。）



第三部分 对“现反”言论的详细交代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作垂死挣扎挑起大规模武斗、妄图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19）68年春夏，由于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学习掌握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发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而热衷于搞武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紧跟而是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发展到了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指示，攻击中央首长，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道路等一系列反动言论，犯了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十几年来来的教育培养，背叛了自己的工人出身家庭。现在我要彻底把自己的反动言论交待出来，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

(19) 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对四川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离了大方向，并且两大派群众组织在阶级敌人挑动下大规模武斗，严重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当3·15指示¹正式下达前，我就在同学中散布说这不像毛主席司令部发出来的声音，是造的谣。当3·15指示正式下达后，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充分从自己头脑中反映出来和表现出来了，并发展到不满和公开对抗并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央首长等反革命言论，实则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毛

1 3·15 指示：指 1968 年 3 月 15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的讲话，其要点是严厉批评了成都的红成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打刘张”（打倒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康生说：“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周恩来接着说：“就是刘、邓复辟。”如此严重的定性使红成、八一五派遭到沉重打击，许多人发牢骚，说怪话，甚至有些公开表示不满的言论。

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反分子。

4 月份，我班部分同学在江北织造厂劳动，也搞武斗。在一次和轻技校唐××、吴××等同学对 3·15 指示议论和发牢骚时我就开始了攻击江青同志，说：我们完全白搞了，到头来落个为李廖死党翻案，大方向错了。反到底反军，打死打伤那么多解放军还搞正了。说我们重庆武斗凶，还不是听了江青的文攻武卫号召，所以两派打仗才那么亡命。我们学校潘家坪一仗就被打死了七个，现在都白死了。还胡乱猜测攻击说：也可能是江青有意提出文攻武卫让我们去打，坏人才容易暴露出来、好抓。中国人多死点没关系，这样人也得到了锻炼，等于是个练兵，如今后打起了世界大战来也用不着怎么训练了。吴××当时说：江青说错了也还不是算了。

(19) 68 年 5 月份，我和吴××、胡××等人在寝室里吹牛，当时谈到搞武斗的人今后可能都要遭，吴××说重大现在人很少，学校空空的，只有少数搞武斗的人在校，其他的都回家了，都想不通。说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个地步，落得这个下场，早知不要介入，所以很多人都走了，不介入了。还说：所以现在一般大学生反动思想严重，中学生搞武斗凶，一般无政府主义很严重。当时我就非常错误的认为和攻击江青同志说：我也想不通，我们参加搞武斗还不是听了江青的文攻武卫号召。不是的话，武斗也还搞不到这样凶。主要是听了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后两派有了借口，而现在江青也不管我们了。还说：我们还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5 月中旬有一天，我在寝室里和吴××、胡××、周××、张××（307 的）等人谈到武斗方面的损失，及打死的人今后如何处理方面的情况时，吴××说：还好你我还没有被打死，像那些被打死了的才划不来，还不是算了。那时主要认为是搞文攻武卫。当时我就高声地攻击说：我们参加武斗主要是听了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号召，我校死的尽是好同志，一直造反的老造反派。我班衡三宝就是积极响应了江青的文攻武卫号召死在文攻武卫中了，我也差点死在江青的文攻武卫中。同时还越说越激动，自以为得行的比喻诬蔑说：武斗中双方打死的人就等于是记入了江青文攻武卫的簿子，你我也差点登上去了，算运气好。

张××当时对我说：确实也是这样，不过这样说别人要说你攻击江青，我们几个人之间这样说倒没得啥子。但我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学生怕啥子？有啥子就是要说，事实也是这样嘛！那时周××还吹捧我：周文川现在还有点会说了吧。当时我听了很舒服的，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很正确。

(19) 68 年 5 月 307 班的张××常到我们寝室来耍，与我和吴××、周××、杨××等人摆谈形势和看法。当时张××谈到一个徐州问题。说徐州的某派也是拥军的，后来中央表了态，解放军转了向，对拥军派进行了剿匪，结局很惨。

还说湖南高司也是老造反派，结果一贯搞武斗搞打、砸、抢得行的湘江风雷还搞正了，高司垮了，全国的几个老造反派西安交大、哈军工都压垮了。还悲观的估计说，3·15讲话要54军转变对反到底的感情，说8·15大方向错了，为李廖翻案，可能今后结局也不会比徐州好多少，红成现在都要压垮了。

当时我就说：中央首长完全偏信了张国华的汇报。8·15的材料被省革筹刘、张扣了送不上去，张国华实际上也是一个铁杆反到底。江青也完全是听信和看了一边的材料。如像说梁司令员说反到底百分之七十是坏人，而梁司令员没有说过，就敢顶。不是54军直接向中央汇报了一些材料的话，我们可能还遭得惨些。并攻击江青说：尽是江青在讲，其实江青的功劳根本没有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首长大。过去很少听说过江青，她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立了功，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长，在全国都有了很高的威信。所以现在好多讲话和解决一些问题尽是她出面在说。还攻击说：江青是啥子旗手哟，不是她提出文攻武卫号召，武斗根本没有这样严重。同时还攻击康老说：康老头阴倒可恶，完全是一个铁杆反到底，他虽然很少说话，但都是突然杀一腰枪出来，说我们是为李廖死党翻案等，把我们杀得好惨哟，简直一点好的都没有了！刘、张就是有问题，涪陵、泸州打死那么多人就是他们搞的！

在（19）68年6月份，有一天我和周××、吴××、胡××、蔡××等人在周××寝室里摆谈说现在武斗不知要打好久才制止得了？现在成立了省、市革委会还打得这样凶。在谈话中我诬蔑攻击说：现在好久没有提文攻武卫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江青犯了错误了。周××也说：现在真是好久没有听见江青讲话和出面了，可能犯错误了。

我还在谈话中歪曲中央首长讲话，为自己搞武斗辩护说：江青说小青年爱玩枪嘛，你我这些学生搞武斗确实喜欢耍枪。也主要是想要枪，真枪实弹的打好过瘾哟！过去很喜欢手枪，做木头枪，想不到现在硬是有了真的了，而且什么枪都要过。

（19）68年8月底，我和吴××、罗××、胡××等人在寝室里唱现代京剧选段和谈到江青创立现代样板剧、搞文艺、戏剧很得行时，我便诬蔑攻击说：那当然得行哟，江青解放前曾经是上海演旧戏、才子佳人的演员，是上海出名的演员明星。所以现在搞文艺革命和现代戏很得行。由于当时有抗日爱国的思想，比较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到了延安（这是我到重大无线电系王××那里去要在他们寝室里听他们说的）。并说：江青这辈子好划得来¹哟，现在全世界都出了名，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还说：江青这样得行还不是毛主席帮助的，其实江青好多讲话都是毛主席的意思。

¹ 划得来：方言词，值得、赚了之意。

(19) 68年9月16日中央首长处理四川泸州、涪陵等问题的9·16指示¹下来后，有一天我与胡××、蔡××、罗××、吴××在周××寝室里吹牛，说反到底这回在泸州、涪陵问题上输了。在谈到9·16讲话中批评了几个男同志，而称赞泸化厂的一个女同志说话简明扼要、说明问题时，吴××说：那几个男的遭江青踏屑²惨了。我便攻击说：她自己都是女的，当然要表扬那个女的哟。可能主要是要提高女的政治地位，所以现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无论如何都要考虑一个女的。我们学校还不是这样，其实有的工作能力强都不强，只起个代表妇女的作用。并胡说：假如江青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话，那男的还要被踏屑惨，女的可能还要把男的马³倒起。

下面是我谈论毛主席的其它反动言论：

(19) 68年7月份，有一天我和吴××、蔡××、胡××、郑××在我们寝室里摆谈“二月兵变”⁴以及假如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话，我国差点变色被刘少奇一伙篡夺国家大权等问题时说：自古以来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亲信。像林彪、周总理这些人是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毛主席最相信的，其实就等于是毛主席的亲信，所以毛主席把军权交给了林彪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掌握。不然的话我国可能早就被刘少奇一伙篡权了，你我这些人哪里还能在这里坐起哟，早就被押去服苦役去了！

还有一次我们几人谈到毛主席很辛苦，每天很晚睡觉，不仅要处理我们国家的大事，还要处理和解决国际大事，领导世界各国人民干革命等情况时，我就说：哪里样样都要毛主席亲自处理嘛，除一些重大事情必须是毛主席亲自处理外，好多问题都是由其他中央首长或主席办公室的人处理了，或请示一下毛主席。陈伯达是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是毛主席的秘书又是党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基本上能代表主席的思想。有些文件和讲话稿由陈伯达起个草毛主席改一下和审查一遍就能代表毛主席的意思了。比如说我校程校长过去作报告，有的就是王光照起的草，但要经过程校长自己审查、修改后再到全校作报告。并还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今后毛主席的年龄大了，精力也没有那样充沛了，好多工作就要交给林副主席，只是有的重大问题还要请示毛主席，但就相当于名誉主席了，就像周总理是政协名誉主席一样。吴××当时说：今后毛主席年龄大了，要辞职也是不可能的，全国人民是决不会同意的，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威信好高哟。我说：肯

¹ 指1968年9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人接见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² 踏屑：方言词，挖苦、贬低之意。

³ 马：方言词，欺压、逼迫之意。

⁴ “二月兵变”：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的“防政变”指示和林彪、周恩来等人有关“防政变”的讲话、措施精神的误导下，1966年7月前后在北京学生中开始流传的有关彭真、贺龙等人曾企图在1966年2月搞兵变的谣言。康生在对群众讲话中曾为此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直到1974年为贺龙恢复名誉时中央才认定“二月兵变”的说法“纯系讹传”，1980年中央则改称这“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定嘛，五几年毛主席就主动提出不要再当国家主席，全国人民都不愿意，想不通、不放心。那时毛主席还做了好多说服工作，才把大家说通了。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使人民深深懂得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革命就受到挫折、失败。

（19）68年9月份有一天，我和吴××、周××、罗××、蔡××、谈到江青等几个中央首长都是眼镜，林副主席、周总理作报告和看文件时也戴了眼镜，只有毛主席没看见戴过眼镜。我就说：那时在战争环境下好艰苦嘛，条件又差，所以好多首长眼睛都坏了，视力不好。那时办公，写个什么，看个什么文件晚上用的都是油灯。毛主席更是辛苦，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还要写一些著作，可能眼睛也搞近视了，或者有老光，但再怎么也不会戴眼镜嘛，或想办法医好，领袖戴个眼镜不怎么好得！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诬蔑。

在（19）68年具体哪个月记不起了，我在周××他们寝室里找到一本《红旗飘飘》¹的革命战争回忆录的书，上面有为彭德怀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文章，我看后就对班上的同学讲：彭德怀过去还是有点得行地，功劳还是不小，所以还是要给他一定的职位和工作，听说现在在某个海军部队当政委，打美蒋军舰章江号和剑门号都有他参加指挥（从哪里听说的记不起了）。这些反动言论完全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鸣不平。当时李×还说：哪里是海军嘛？是在搞三线建设，听说还在泸州化工厂当党委书记。当时不知是谁（此人记不起了）还说：彭德怀过去是有点凶²，是我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后来遭撤了职。解放一江山岛的电影里还演了彭德怀到了一江山岛后，解放军战士都高呼：彭老总来了……（当时有胡××在场，还有谁在场回忆不起了）。

（19）68年5月份有一天我和罗××、胡××、周××、吴××在寝室里吹牛，当时谈到有关“二月兵变”以及刘少奇原来一直是我国最高领导人之一，名列第二，想不到现在揪出来是个妄图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坏蛋，以及现在不知怎么不公开点刘少奇的名，而只提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等问题时，我便说：像刘少奇这些人过去当那么大的官，名列第二，在世界上都出名，可能是照顾到国际影响，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开党代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权没有了，但还没有撤职，所以不公开点名。开始时在北京连写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都不准上街。这可能是中央有步骤，那时他还有些权，怕他狗急跳墙，等把权慢慢的夺回来了，才“医治”他，所以头两次接见红卫兵都有他。还继续大发反动谬论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过去还是有功的，不然怎么当那么大的官？过去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全部工作都是交给了刘少奇的，他还是专门负责搞地下工作的。邓小平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有点高地，赫光头³都怕他。过

¹ 《红旗飘飘》：五十年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丛书。

² 凶：方言词，厉害，了不起之意。

³ 赫光头：指赫鲁晓夫。在60年代批判“苏修”后中国民间对赫鲁晓夫的蔑称。

去他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赫光头辩论，赫光头根本说不赢他，回来时毛主席还亲自去迎接。这些人可能今后还是要给一定的工作，生活上还是过得很好，有轿车，有随从人员，但这些人又起了个监视他们的作用。

吴××也是自以为什么都很知道的说：邓小平在党里面是精通马列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嘴巴很会说。还说：邓小平军事也得行嘛，过去的刘邓大军好凶哟……以上我的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为刘、邓歌功颂德的现反言论。

1969. 5. 15.

第四部分 我对犯罪的认识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很多严重错误和罪行，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为严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对抗中央3·15指示，攻击中央首长，把矛头指向了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了一些反动的言论，犯了很大的罪。

过去自己总认为自己出身好，不是安心想当反革命，说反动话。以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是单纯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受阶级敌人散布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等反动思潮的影响造成的，并产生了对自己的问题搞得太过火了的思想和。

通过工宣队、校革委的启发教育、群众尖锐的批判斗争，通过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自己带着思想上的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才比较清醒的看到那种还没有找到自己犯错误犯罪的根子和实质，没有真正触及到灵魂，实际上也就等于为自己的罪过辩护，这样下去就一定还会犯更大的错误、更大的罪，以致自毁。

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带着思想问题和过去的错误思想，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高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才比较清醒的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根源。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副主席也指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我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在旧社会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有着很深的阶级仇、血泪史。过去母亲多次地向我进行过生动的忆苦思甜的教育，痛苦流涕

的诉说自己旧社会一生悲惨遭遇和苦难历史。还特地为了教育我和妹妹，留下了疤上重疤的在旧社会用来遮身避体的破烂衣服。教育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批评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我呢，每次都不耐烦听，还顶嘴说：“现在是新社会，又不是旧社会，还说那些干啥”，是“爱翻老话”，甚至跑得远远的不听。还叫“把烂衣服拿去扔了，留着有什么用？”

我当时要扔掉的不是一两件烂衣服，而是扔掉了对旧社会的恨，对剥削阶级的仇。体会不到新社会的甜，忘了本。可见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自己头脑里也是中毒很深的。而刘少奇就是要我们忘记阶级苦、阶级斗争，以达到其复辟迷梦。忘记了阶级苦，忘了本，它是我走上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因之一。

学习了毛主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的教导后，我深刻的认识到：广大的劳动人民和世界上各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人们为什么那样对党和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阶级的仇，没有忘记阶级斗争，没有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就是因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获得解放。

而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走上了犯罪道路，攻击中央首长，对抗中央指示，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有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恨不起来，认为这些人过去不简单、有功的，实际上为其歌功颂德。就是因为自己忘了阶级苦、忘了本。因此从内心深处缺乏真正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带着阶级感情读毛主席的书。相反还看了一些坏书，如：《红旗飘飘》、《黑修养》¹等。所以在自己思想上阶级观念模糊。而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能克服，对坏思想、对毒草就不能识别，不能抵制，逐步滑向犯罪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结合自己的犯罪事实逐一检查，我深刻的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必然受各种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来，并逐步树立自己的世界观，“或者是无

¹ 指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后被蔑称为“黑修养”。

产阶级一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一家。”必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我虽然是红旗下长大的，受党的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但同时也时时受到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的被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我过去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就是因为自己不加强思想改造，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去识别一切，分析一切，去战胜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却错误的认为“现在是新社会又不是旧社会”，出身好不会犯错误，想回避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这也正是自己给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影响大开方便之门，而使自己走上邪路，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自己所犯罪就是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身上的反映。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要念念不忘突出政治，要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由于自己没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自觉改造思想，去抵制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毒草的侵蚀，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去专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政，因此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便侵蚀了自己的头脑，专了自己思想的政，世界观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说话、干事，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与无产阶级事业格格不入。一遇到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情况下，或是稍微有适合自己头脑里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气候，就站不稳立场，迷失方向，识不破敌人的阴谋花招，就抵制不住，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充分表现出来。甚至连党中央、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一言一行都是为个人的利益，派别、山头的利益，参加武斗干了很多坏事，起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进而发展到对抗中央3·15指示，对中央指示中央首长不满，攻击中央首长，矛头指向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很大的罪。自己犯罪的言行说明自己是为阶级敌人效了劳，客观上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是个立场问题，是走上了一条反革命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我犯的罪确实是严重的，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完全是应该的，而决不是什么过火了。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打倒的是我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及流毒，冲掉了我头脑中的污垢，是在挽救我。

我深刻认识到，若不是工宣队、校革委领导下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斗争，我还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罪，还将发展到更加危险的道路上去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通过群众的批斗，深深的触及了我的灵魂深处，使我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罪的严重性及其根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毛主席派

来的亲人工宣队挽救了我，给我出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和自己犯罪的沉痛教训，永远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教导，自觉的好好的读毛主席的书，用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教导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铲除头脑中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余毒，彻底转变世界观，把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重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锤炼自己的一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限忠心。锤炼自己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不转向，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不回头。

1970. 1. 27

【编读往来】

郭予庆谈 56 期于运深口述和舒云的回复

读者郭予庆来信说：

59 期《昨天》刊载的于运深口述回忆很有价值，于作为林彪的秘书，是当年许多高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文中也有一些事件非他所亲历，却未注明出处。如文中关于 1970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的政治局会议，3 月 16 日的政治局会议，3 月 17 日—20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文中看出于当时随林彪在苏州，并未亲历这些事件，但文中没注明出处。又如文中关于 1970 年 9 月 1 日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接见黄永胜的讲话内容，从文中看不出于与该事件的直接关联，但此事的记述也未说明依据。以上记述如系引用或转述他人所述，应做注明。这是口述回忆应当注意的。

于运深口述的整理者舒云回复：

那几次会议的情况，是叶群（代表林彪出席）让于运深向林彪报告的，于运深应算知情者。林彪让于运深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提出毛当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林彪甚至不敢说不当国家主席）。正因为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话，由林彪当国家主席，让叶群转告林彪。如果没有毛主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话，林彪也不可能让于运深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林彪从来没有说过当国家主席。

黄永胜上庐山先与毛泽东面谈后，来见林彪。于运深正在林彪身边，听到黄永胜说刚从主席那里来。对此事，于运深也应该算知情者。

刘建业对舒云文章的一点质疑

贵刊 56 期舒云文章《林彪知道去苏联吗？——与张光渝先生商榷》中写到：“林豆豆报告的本意是要 8341 部队保护林彪，不让叶群、林立果带走林彪。荷枪实弹的 8341 警卫部队，拦阻林彪这位手无寸铁的老人有何困难？可是从林豆豆第一次报告到第五次报告，8341 部队有两个多小时的充足时间，却没有接到拦阻命令……”

应该说，阻拦手无寸铁的老人的确不难，但阻拦林彪就很难。我们不能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林彪外逃）作为预设条件，来推论此前的事情。须知，此前的林彪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是毛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是普通百姓每天都要顶礼膜拜、敬祝“身体永远健康”的“神”。别说 8341 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人，即便是张耀祠、汪东兴甚至周恩来，在突发事件、还摸不准情况的前提下，敢下这样的命令吗？

舒云的观点其实预设了两个前提：

1. 林豆豆的举报确实可靠；
2. 林彪确实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外逃。

即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林豆豆的举报属实，但在当时恐怕谁也判断不了真伪。不仅李文普不信，连周恩来开始都认为是不是林家又闹什么矛盾了？可见林豆豆的举报，当时并不能给人严肃认真诚实可信的感觉。

至于外逃究竟是林彪本人意愿，还是真的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挟持，即使现在也很难下定论，何况当时？我们看到的是，答应过林豆豆“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的李文普并没有干预，说明林彪不是“被弄上车”的；李文普中途下车，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是不是也从侧面说明了林彪不是被“绑架”的？

如果没有了两个预设前提，林彪的一次正常出行——即便是有被绑架外逃的可能——8341 部队能随意拦截吗？北京方面的上级恐怕也拿不出任何理由下达拦截的命令吧？

2015. 9. 13